

2023.02 特刊

# 小鳥



以文学之名



“伦罗特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一种疲倦的胜利感、一种像宇宙一般寥廓的憎恨、一种不比那憎恨小多少的悲哀。”

这是博尔赫斯在《死亡与指南针》中里的一段话。那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声音？

每句话都切中每一次我们试图忆起过去三年时的感受。

历史学家王明轲说，当研究族群问题时，并不是回答“我们是谁”，而是解答“为何我们要宣称自己是谁”。

我们选择记忆，选择忘记。几千年过去，最后成了我们现在向别人说讲述的样子。

“当人们在回忆一个故事时，事实上是在重新建构这个故事”。

我们执拗地选择以我们的方式记忆。事实上是建构我们的世界，为何我们是我们。

三年，我们选择六篇文章，他们来自：方方、陈冲、李海鹏、江雪、罗新与播客“随机波动”的对谈实录，以及，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摘录。

03

《武汉日记》/ 方方

08

《一生所学，只为此刻》/ 罗新

13

《长安十日》/ 江雪

17

《孩子们的街道》/ 李海鹏

20

《我们将死于梦醒》/ 陈冲

25

《现代性与大屠杀》/ 齐格蒙·鲍曼



# 武汉日记

方方

## 1 月 25 日 (正月初一)： 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不知道我的微博还能不能发出来。前一阵，因为反对年轻人街头集体爆粗口，导致微博被封（我现在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就是表达爱国，也不能以街头集体爆粗口为荣，这是文明问题！）。投诉无门，起诉无门。所以对新浪网极度失望，准备就此永远不再开微博了。

但是，没料到现今武汉发生如此严重的灾难。导致武汉成为全国的中心，导致封城，导致武汉人到处被嫌弃，也导致我被封在城里。今天政府再度有令：中心区域今夜零点，开始严禁机动车行驶。而我又恰住在中心区内。很多人来询问，也有人私信，大家都在关心和问候，让我们这些被封在家中的入倍觉温暖。刚才《收获》程永新给我发信息，说不妨写写“封城记”。

闻此始觉，如果我的微博还能继续发出文字的话，我还应该继续下去。也只好让大家知道武汉真实的近况。

只是，我并不知道这一条能不能发出来。如有朋友能看到，就请留个言，让我知道可以发了。微博有一种技术：就是你以为你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人能看得到。自从知道有此一技术后，方明白：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先发了试试吧。

## 1 月 26 日 (正月初二)： 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关心。武汉人仍处在关键时刻，尽管人们已从最初的恐慌、无助、焦虑、紧张中走了出来，现在业已平静和安定了很多，但仍然需要大家的安慰和鼓励。

到今天为止，至少大多数的武汉人已经不再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了。我原想从 12 月 31 日开始，复盘我自己在这段从警惕到松懈的全过程，但是这一写，就太长了。所以，我还是先实时写一点新近的感受，再慢慢来写“封城记录”。

昨天初一，依然冷风冷雨。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当然是国家支援的力度越来越大，更多的医护人员赶来武汉，等等等等，让武汉人心安了许多。这些，大家都已知道。而我自己的好消息则是：目前我的亲人无一感染。我小哥尽管住在疫区中心，华南海鲜市场和汉口中心医院就在他家左右。而小哥身体不算好，此前也常出入那家医院，所幸小哥小嫂并未有事。小哥说是已经备足了十天的菜，完全不

出门。我和我女儿还有我大哥一家，都住武昌。一江之隔，危险系数比汉口略低，也都平安。尽管被封在家里，倒也没有觉得很无聊。我们大概都属于宅惯了的人。只有从外地回家探望父母的侄女和她儿子，有些糟心。本来是 23 日坐高铁离开武汉，去广州与丈夫和公婆会合（其实真要去了，日子也未见得比武汉好过），结果恰巧那天封城，没能走脱。封城将会到何月何日，是否会耽误工作及孩子上学，都是问题。但因他们所持护照是新加坡的，昨天接到新加坡政府通知，近日将有飞机来汉接他们回去（估计武汉新加坡侨民也有不少）。他们返回后需隔离 14 天。这个消息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更好的消息是，我女儿的父亲，在上海住院，起先拍片，肺部有阴影，昨天也解除警报，应是普通感冒，未被新冠病毒感染，今天即可出院。如此，近期曾经与他一起吃过饭的女儿，也就不再被严密隔离在她自己的住所（大年三十，是我冒雨开车给她送饭吃的！）。多么希望这一类的好信息，每天都来一点，尽管封城，尽管关闭在家，至少我们心情可以轻松一些。

坏的消息仍然有。昨天白天，女儿告诉我，她熟人的父亲（本身是肝癌患者）疑似感染，送到医院，也无人救治，三小时便死亡。这大概是前两天的事。电话里，她也很难过。而在昨夜，单位小李打来电话，说我居住的文联大院已发现两位被感染者。三十七岁，是同一家人。要我注意安全。他们的住处离我家大概两三百米。但我的住房是独门独院，所以我倒不会有更多的担心。倒是他们同单元楼的邻居，会有点紧张了。今天又听同事说，他们属于轻微感染，在家隔离治疗。年轻人，体质好，感染轻，应该很快能抗过去。祈祷他们早日康复。

昨天湖北的新闻发布会上热搜。看到好多人吐槽。三个官员神情充满沮丧疲惫，频频出错，说明内心也乱。其实也很可怜。他们应该也有家人在汉，他们的自责我相信是真的。事情究竟怎么会走到这步，事后复盘，自然得知。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官员们的手足无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恐慌，给所有武汉人带来伤害，这些我会在文章中细写。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头上，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道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武汉抢前争先，只不过先吃了一个大的而已。



2月6日(正月十三):  
现在,全武汉的人都在为他哭泣

今天的武汉,又开始了下雨。天色阴沉。阴沉中的风雨天,会让人有一种肃杀感。出门冷风一扑,浑身一凛。

但今天更多的是好消息。是这么多天来,最令人激动的消息。先是听到一个广播,说疫情将很快缓解。讲述者据说是一位专家。至少我听了觉得可信。接着网上盛传,美国吉利得研究的新药瑞德西韦(又被音译为“人民的希望”)在金银潭医院启动试验,传说效果很好。武汉人都很激动,如果不是遵守规则,不能出门,大概早就上街狂欢了吧。关了这么久,盼了这么久,总算看到希望,而且来得那么迅猛,来得那么及时,正是在大家日渐沮丧的时候来的。尽管后来,有人辟谣,说是并没有结果。但我想,管他的,还是拿它当好消息听吧。再等三天,或许我们的期待就会证实。大家关注的方舱医院已经正式开始使用。一些入院的病人发了视频、图片和文字到网上。有人认为条件太差,亦有牢骚,诸如此类。但我想,只用了一天时间建成的方舱,仓促之处,总会有的。而后续的工作,应该很快会跟上。这么多人在一起,众口难调,更何况都是病人。焦躁不安或是心烦意乱,总会有的,毕竟舒适度不如自家。下午武大冯天瑜先生给我发来信息,说阎志告诉他,他们负责会展中心和武汉客厅两个方舱医院,他会全力做好保障。“安装多台电视、设图书角、设充电岛、设快餐角、保证每个患者每天一个苹果或香蕉,尽量让患者感到温暖。”看看,其实都有考虑。其他方舱医院,恐怕也都会有责任制。阎志能做到的,其他责任人多半也能做到。武汉已经走到今天,最难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度过,现在越发不能焦急。让那些曾经天天奔波的病人,能安静地躺在室内,接受隔离,也接受医护人员的治疗,无论如何,对他们对大家都是好事。不然,像今天这样的天气,他们中又有多少人会病症加重,或是倒在路上?所以,我们只能稳住也忍住,只有总局势控制住了,所有人才真正得到安稳。

早上还看到一个视频,是中南医院呼吸科大夫的。他自己中了招,九死一生。现在活了过来,他很幽默地告诉大家事情经过。他是直接接触了病人而感染。后来他的夫人在他垂死之际照顾他,虽然感染了,但只是轻症。所以他让大家不要恐慌。并且说,这次扛不过去的,发展成重症的,多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年轻人如果中招,个人体质好,打针吃药喝水休息,做到这些,是很容易扛过去的。他还说了一些新冠肺炎的特征,比方,是双肺一起由边缘感染,并无明显的流鼻涕等现象等等。作为过来人,他的话,太可信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做的仍然是,待在家里,不要恐慌。不要自乱阵脚,哪怕有点发烧或咳嗽,一定要冷静处事。今天政府还告示,所有人都要查体温。人们也是一阵慌乱,害怕在查体温中反而遭遇感染。但据我了解,只是为疑似者上门测体温,其他人电话自报体温给社区即可。所以,也不必人人自危。抗疫过程,跟日常生活一样,有很多蠢人做蠢事,但更多的是不是蠢人,也不尽然都是蠢事。

说说我自己。一起床即看手机,邻居留言,说她女儿今天出去买菜,顺便给我带了一些,放在我家大门口,让我起床后出去拿一下。刚把菜拿回来,住在同院里的姨侄女来电话说,要送一些香肠和腐乳过来,大门口交接即可。结果她拿来了一堆东西。我一看,这就是再关一个月,也吃不完呀。灾难之中,大家同舟共济。很感谢,也很温暖。

刚刚写完博客,便听到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他是八位被训诫的医生之一,而且被感染新冠肺炎。现在,全武汉市的人都在为他哭泣。心里太难过了。

2月7日(正月十四):  
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

从封城到今日,是第十六天。昨天李文亮死了。我很难过。当即发朋友圈说,今晚全武汉人都在为他哭泣。哪知,整个中国的人都在为他而哭!眼泪多得在网上涌起惊涛骇浪。这一夜,李文亮是在人们的泪水中渡到另一个世界。今天天气阴沉,不知道是否苍天也在向他致以哀悼。其实,我们对苍天已然无语,毕竟苍天又奈其何。中午,有武汉人在大声叫着:李文亮的家人和孩子,由我们武汉人养起来!响应者众。晚上,武汉人要在李文亮昨夜去世的时间关灯,用电筒或是手机,向天空射一束光,吹响口哨。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这么久了,武汉人能有什么办法化解自己心里的郁闷、悲伤和愤怒呢?或许,只能这样。

专家原说拐点可能在元宵节出现。现在看来,它还没有来。昨天来的是李文亮的死讯,今天来的却是:还要再关十四天。唉,那些没有置身武汉的人是不会明白的,我们内心所受的伤害,远不只是关在家里不能出来这一件事。武汉人是多么需要安抚和宣泄。这就是为什么李文亮之死,让所有武汉人都肝肠寸断?让他们想要狂哭大喊?因为,人们觉得李文亮就是与自己一样的人,就是困在家中的自己。疫情比先前预计得严重。病毒的传染速度更是比人们想象得快。而其诡谲神秘的状态,让有经验的医生都捉摸不透。有些人明明已经好转,突然间又急转直下生命垂危。而有些人分明感染了,却又什么事都没有。这个幽灵一样的冠状病毒,就是这样四处流窜,随时随地让人猝不及防。受伤惨烈的其实还是医护人员。他们是最早接触到患者的人。仅李文亮所在的中心医院,死去的不是一个李文亮。我听说已有三位医生离世。我的医生朋友说,同济亦有一位外科教授去世,那是他的朋友。几乎每个医院都有数位医护人员病倒在床。他们全都是用生命救人的仁心医者。

有一点点可以庆幸的是: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多是在疫情的早期阶段染病的。唉,不是说好了“人不传人”吗?那时的医生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穿得像防化部队?正是在被认为“人不传人”的时间里,同时也是湖北武汉忙于开两会、不准发负面消息的时间里,有诸多医护人员感染,被殃及的还有他们的家人。医生朋友说,重症几乎都来自那一阶段。但现在防护装备齐全,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已经很少了。即使有,也多为轻症。他主动转到了另一个话题,说后来越来越多的

医生被感染，大家也知道“人可传人”，却没有人大声说出来，因为不准说。不准说就不说吗？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所有人都说不出来，难道不也是问题？医院的领导为什么不准说？他们不准说，难道我们就不说？我们做医生的，自己也有责任。他直接拷问自己和自己的同行。我很佩服他在此时所做的反思。

我想，是呀，这正是我们为李文亮之死悲愤的原因。毕竟，他先说出来了，尽管他只是提醒自己的朋友，但他还是说破了真相。只是，说出真相的李文亮，受到责罚，丢了性命，到死都没人向他道歉。这样的结果，今后是否还会有人敢说？人们喜欢用沉默是金，来表示自己的深刻。但这一次的沉默，是什么？我们是否还会面临同样的沉默？

武汉整个城市，到现在仍然井然有序。和前些天比，乐观的武汉人多了些压抑和沉闷。毕竟关在家的时间太久，而且很多家庭的空间并不大。即使有无边无际的网络，也会有厌倦的时候。更何况，每个人都还有自身的问题。比如像我和两个哥哥，都是糖尿病患者，医生是要求我们每天都要走路的。大哥以前的微信步数，常常上万。小哥更是，每天上午下午都必须到外面去散步。现在，他已经整整十六天没有出过门了。而我，尽管已经是隔一天吃一次药，但也只剩下明天一天的量。要不要去趟医院呢？我也在犹豫。刚才我看了一个视频，看到武汉市民开着八辆车，为李文亮送行。八辆车代表着受训诫的八个人。他们眼里都饱含热泪，话语哽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硬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智。恐怕，未来数日，武汉人的心理问题，会越来越多，需要专家疏导。段子手的黑色幽默也解决不了这么沉重的问题。

**3 月 23 日：**  
**所有的疑问，都无人回应**

封城第 61 天。我从初一（元月 25 日）开始在微博作记录，比封城晚了两天。所以，这是第 59 篇。

今日大晴。很舒服的天气。下午终于把狗送到了宠物医院。它的皮肤病再次发作，全身溃烂，不治疗也是不行了。我自己手指也裂口，不敢轻易处理。宠物医院很快给我发来视频，说洗了一大盆黑水。并且要把它的毛全部剃光治疗。这只狗是 2003 年圣诞夜出生的，今年年底将满 17 岁，也是实在太老了。与我同期养的那些狗，几乎全部死了，只有我家这只坚强地活着，而且能吃能玩，现在有点老眼昏花，听力衰退。进入老年后，它的皮肤问题就很难治断根。平时我隔一阵送它去宠物医院洗药浴，吃药并治疗。但这一次，时间隔得太久了。好在，一切好转，有医院照顾它，我也总算放下心来。街上，好几条公交线路开始试运行，地铁站也在清理和消毒，为即将开始的通行做准备。这些消息，人们纷纷相互传达，均有惊喜之感。而之前每天公布的惊悚数字，现在一律是零。持续为零，已有五天。

小哥一早便在群里贴照片，他们小区今天有人来理发。说是十分钟快剪，正好在他家窗下的操场上。今天的阳光晴好，居民们相隔一米左右，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小哥说，

排了一整天。这个小区曾经是武汉危险度最高的小区之一，现在也列入无疫情小区名单里。小哥宅家里的时间已远超六十天，他今天显得特别轻松。对于小哥这样身体比较弱的人来说，两个月没有生病是上天对他的恩赐。

春节前，从武汉外出的人，用周市长的话说，有五百万。这几天已经看到通知，凭着健康码，他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回来。我家阿姨也给我留言，她大约在这两天也会到家。一批逗留在海南的同学，原来我们还约着一起吃海鲜来着，结果天天看他们在海边晃。我们被困在家，他们被困在外，现在他们也可以轻松地驱车返汉。

据说，现在的武汉，进来容易，出去难。这让我想到，那些在封城之前来到武汉的人呢？他们是否还在这里？滞留武汉两个月，恐怕也算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吧？他们会有多少人呢？恐怕没有人精确地统计过。我今天随便问了一下，发现竟也不是小数目，而且他们仍然在此滞留。目前，武汉所有的交通工具均未开通，飞机、火车、长途汽车，甚至自驾的小车，也都不能外出。那些滞留在武汉的人们，以及为他们担惊受怕的家人，怎样度过这冬去春来的两个月，想想觉得好辛苦。

邻居小 Y 告诉我，在他们的“影子梦之队”志愿者中，就有两个回不去的外地人，一个是广西南宁的，他是看到武汉疫情后，专门赶来当志愿者的，结果遇上封城，回不去了。还有一个是广东人，也是没有交通工具回去。志愿者队伍管他们的吃喝住，还准备开城后，帮他们买返程的车票。一直跟我介绍疫情进展情况的医生朋友今天也说，他有几个朋友，封城前来武汉出差，结果都被封在了这里，回家不得。这一待即两个月，来时尚是寒冬，此时春分已过，连衣服都没有得换。有个朋友是北京一家公司的老总，人回不去，公司也无法运作。

在疫情中，这些不幸滞留在武汉的人们，真是太边缘了。很长时间内，甚至没有人想起他们。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没吃没喝住在城市的地下通道时，被记者发现，写了出来。人们这才想到：哦，还有这样一批人。哦，这些人太惨了。政府也出台了一些办法，让他们有地方可住。然后，又有这么多时间过去了，想不到的是：他们居然还滞留在这里。他们比起有家的九百万武汉人，更急切地等待着开城。有时候想，这世上如果多几个有心人，帮着政府出出主意，想点办法，让他们早点回家，不也很好吗？比方，统计一下人数，看看他们的健康码，一个省一辆车，送他们到其省会，由对方指定酒店隔离，14 天后即可回去。这也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呀。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可以帮助那么多人从困境中解脱，为什么不试着做一下？

北京拒绝湖北的人入京的信息，从昨天传到今天。我一直不敢相信，直到现在，我仍觉得不可信。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一个健康的湖北人和一个健康的非湖北人有什么差别。如果北京真的拒绝湖北人进京，那是湖北人的倒霉，却并不是湖北人的耻辱。耻辱的是提出这个建议和采纳这个建议的人。当然，也是文明的耻辱。很多年后，我们回头看，原来，2020 年，我们的文明史是在这样的一个刻度上。所以，我

现在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 不过它却值得记录下来。

今天也有一个坏消息: 很多天前, 在武汉援助的医护人员中, 一个广西的年轻护士在医院里突然昏厥。得幸当时很多医生在场, 迅速急救, 将她抢救了过来。这件事, 媒体都有过报道, 我们也为她的死里逃生而庆幸。但是晚上, 医生朋友告诉我, 她还是去世了。生命中断在抗疫的最前线。她叫梁小霞, 今年 28 岁。让我们永远记住她, 也愿她安息。

这几天, 追责的声音, 非常微弱, 我自己也几乎忽略了这件事。记者们的深度调查, 似乎也变得很少很少, 几近没有。晚上, 看到一篇名为《消失的 41 篇疫情报道》的文章, 文中最后一句说: “扒开隐藏在深处的荆棘, 接受社会暗处的痛楚, 媒体用有限的力量撕开真相, 冲向光明。一些报道虽然在今天短暂消失, 但历史的底稿上一定有属于它们的位置。”我或许有点小醒悟, 试着推测一下: 那些突如其来对我群起攻之的事, 跟删帖会不会是同步的?

但是追责这件事, 我还是愿意相信上上下下会有共识: 这是必须进行的一件事。如果这样天大的事不进行追责, 我不知道怎么向天下人交代。而我也会一直追踪进展。细看了一下, 那些与之相关的人, 按理, 多少也该有几个主动辞职的, 记得 SARS 时都有。可是一直看到今天, 湖北居然一个没有, 真是服了他们。几天前, 看过经济学家华生的几篇文章, 非常有意思。他的文章中提到武汉有一位“深喉”人物。不是这位“深喉”, 疫情可能会被暴露得更晚。准确地说, 这位“深喉”才是真正的吹哨人。看这篇文章时, 脑子里浮现出《潜伏》的画面。前几天跟朋友说, 好想知道这位“深喉”是谁。朋友说, 同感。这个人是可以写进小说里的。

在朋友转给我的一些微信文章中, 我看到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的一篇。杜教授是社会学博士, 他的文章经常会拎出一些紧要问题。在他的这篇文章中, 曾提出七个问题:

- 1. 一线医院发现疫情后, 真的不能使用网络直报系统吗?
- 2. 专家组抵达武汉后, 真的无法掌握人传人的疫情实况吗?
- 3. 疫情信息泄露后, 有关部门真的要优先解决泄露信息的人吗?
- 4. 人人都不肯承担责任, 真的只有钟南山才有资格向公众报告实情吗?
- 5. 武汉疫情日烈, 管理者真的不能提前预判医疗资源的大匮乏吗?
- 6. 当疫情与恐慌同步蔓延时, 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选择吗?
- 7. 封城之后, 真的不能将确诊的病人向其他医疗资源闲置省份妥善分流吗?

其实杜教授应有更多疑问, 第七问之后, 他留下一排省略号。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问完。实际上, 我们在武汉的人, 还可以提出更多疑问。可惜, 几乎所有的疑问, 都无人回应。

今天是我的第 59 篇, 早就跟很多人说过, 我将写到 60 篇就停下, 明天将是最后一篇。不少读者, 为了等着看我的记录,

迟迟不睡觉, 说是生物钟都搞乱了。我想说, 还剩明天一天, 此后, 就不用等了。但我真是很感谢他们的等。

有一点我还是想说, 这是我在疫情中的一份个人记录, 属于纯粹的个人记忆。而最初时, 我甚至不觉得这是日记。因为“日记”二字, 不是我提出的。只是后来, 这份记录, 变成了一日一记, 别人说它是“日记”, 我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它的最初的动机, 是为了完成约稿, 为方便写文章而作的记录。无意间, 走成了这样, 这才真是叫忘了初心。

3 月 24 日: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

封城第 62 天。也是我的记录的第 60 篇, 说是终篇也可以吧。

很巧, 今天看到通告: 武汉以外地区, 已经全部解封, 凭绿码可以自由行动。而武汉市, 将在 4 月 8 日解封。武汉很快就会重新变得生机勃勃。我原说记录到开城, 就终止。后来发现开城并不像封城那样是一个紧急行动。它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一个部分一个区域地开封。所以, 我想, 我完全可以在疫情缓解下来, 大家开始进入工作时终止。跟朋友们也都说了这一想法, 大家几乎全都支持。由此, 也经历了从 54 篇, 延长到 60 篇的过程。意想不到的是, 这最后一篇, 竟与开城通知同步, 真是很值得纪念。也就是说, 我的记录, 从初一开始, 一直写到开城通知下达的那天, 很完整。我大哥在 3 月 14 日根据确诊人数和每天减少的人数做了个计算, 他认为武汉 4 月 8 日可以解封。没想到, 他居然算准了。大哥自己也很高兴, 说“我的粗糙模型居然猜中武汉解封日”。

今天中午天还很明亮, 下午突然暗了下来, 还下了一点雨。阿姨发信息说, 她可能明天回到武汉。我的心头顿时一松。阿姨做饭的手艺不错, 以前同事经常跑到我家来蹭饭, 待市内可以自由流动时, 估计他们蹭饭的时候又快到来, 我自己的艰难日子也终将结束。

关于广西梁护士一事, 今天我必须要做一个清楚的说明。昨晚在写记录时, 我收到医生朋友的信息, 这信息, 也是他的朋友中间相传的。这是一张图片, 上面分段写着: “广西那位晕倒的护士今晚在我们医院走了。也是妈妈的女儿, 只有 28 岁。再也回不去的逆行者, 真的是为武汉拼过命。”医生朋友感慨万千, 我也很难过。此前, 女护士急救的事, 很多媒体都给予过报道。为了确保这个信息准确无误, 我将此图片转给了协和医院一位大咖医生, 请他确认。他给我回复是: “脑死亡, 很不幸”。想来是我的医学知识太缺乏, 我以为针对我的询问这是一个确定的回答。便觉得梁护士不能这样悄无声息而去, 这件事应该记录下来, 以让人们永远记住她。于是写进了昨天的日记。今天很多人对此提出质疑, 网上也有辟谣消息, 下午我再次向两位医生询问。俩医生都对我作了一番带专业性的讲解, 然后态度几乎相同, 说那就还是道个歉吧。我想, 也是。所以, 在这里向所有读者表示真诚歉意, 更要向梁护士家人表示真诚歉意。这也说明,

梁护士的生命，是我们所有人都很关心的事。正像短信中所说“她是为武汉拼过命”的人。希望她有朝一日，能醒过来，我和我的医生朋友都会一直关注她的一切。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提醒。

昨天，有朋友转来一篇文章，说是有人喊话你，请你“去参与武汉市民联署，证明你不是一条美狗”。看这标题，觉得低幼和恶俗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撰文者的名字，我就不提了吧，听说是博士，真不知这书是怎么读过来的。文章还没来得及看，就又听说，官方已找署名者谈话了，这项行动被制止。朋友笑道：你没机会证明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美政客们在相互指责对方，怼得来劲时，而中美的医生们却联合了起来，他们在商量怎样拯救病人，讨论哪些药物对于降低死亡率确实有效，哪种治疗方式更好，也谈怎样防护、怎样隔离之类的话题。在武汉疫情紧张时，华人扫空货架上的口罩，捐赠回国，而此刻的美国医生，却遭遇口罩和其他防护物资的缺乏。有华人朋友说，我心里觉得好对不起他们。而医生们，亦在讨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医生，不带政治偏见，没有国别意识，彼此请教经验，相互提供线索。你能感受到的，就是医者的仁心大爱：这是对人类的愛，对人的愛。我心想，职业不同，果然看事物的角度和做事情的方式，也都完全不同。我喜欢这些医生的职业精神和心理状态。

尽管今天是最后一篇，但并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什么都不写。我的微博仍然是我的平台，我依然会像以前一样，在微博上表达我的观点。而敦促追责的事，我也不会放弃。无论官方怎样想，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死者讨公道。是谁的错误谁的责任，就将由谁自己承担起来。如果我们放弃追责，如果我们将这一段日子遗忘，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

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特别想要感谢那些天天围攻我的极端分子。没有他们的激励，像我这样懒散的人，或许早就不写了，也或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写不了这许多。而我这样的信手拈来的记录，又会有多少人去看呢？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他们此番对我的攻击，几乎拼出了全部家底。集结了他们所有的队伍，差不多每个人都写了文章。但是读者们看到的是什？看到了他们混乱的逻辑，畸形的思想，扭曲的观点，低劣的文字以及下等的人品。总之，他们天天揭自己的短，天天展示自己变态的价值观。人们此刻方恍然：啊？原来这些“极左”大V是这样的！

是的，这就是他们的真实面目，那个给我写信的高中生的文字和思想水平，大约就是他们的最高水平了。其实早就有人对“极左”有过非常精准的概括，网上应该还能查到。这些年来，尽管水平低劣，可他们就像新冠病毒一样，一点点传染我们的社会，伤害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

另外，最后一篇，我自然要说几句感谢话。谢谢那么多读者的支持和鼓励。无数的留言和文章，都让我感到：哦，原来这么多人和我想法一样。原来我的背后并非空空荡荡，而是有一座又一座大山。另外也要感谢二湘，是她在我微博被封时，给我提供了最大帮助。没有二湘，我的日记恐怕也难以记录下去。此外，还要感谢财新网和今日头条，他们亦是在我无处发文时，及时地给我提供平台。这些帮助，从另一个角度，也给了我莫大的心理安慰。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从未觉得孤单。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 一生所学，只为此刻

随机波动、罗新

2月7日，罗新在微博上写了八个字，“一生所学，只为此刻。”这是一个怎样的此刻？有谁同在感受此刻，铭记此刻？一位历史学家的一生所学可以如何解释或烛亮此刻？站在这一时刻望向过去和未来，我们能看见什么，又能相信什么？

在一场罕见的春雪之后，剩余价值邀请罗新老师一起录制了这样一期节目。我们把“此刻”细细分割剖解，从瘟疫封城聊到语言污染，从战时状态聊到民族主义，从饭圈用语聊到个体叙事，最终我们发现，所有的一切收束于“人”。

我们说人，是说人是最高贵的，哪怕死亡近在咫尺，作为人的内心的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去掉的，否则便不再是人。我们说人，说的是作为权利单元、而非利益单元的人，其基本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不能破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我们说人，是有别于体制的鲜活的人，是可以通过努力来维护语言、不说谎话、干净坦荡、与人共情的人。我们说人，是没有什么值得表彰的功绩却值得尊重的普通人，他们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是没有边界的人，无论身在何方、是何民族，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说人，因为相信人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每一代人都有自救的努力和途径，是因为希望不从别处来，而正从人身上来。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节目中，我们聊的是瘟疫、是历史、是中国，我们聊的也是社会痼疾、是此时此刻、是我们所有人。

## 01 疫情过后，我们可能会陷入相当长的心理创伤期

**剩余价值：**疫情期间隔离在家的这段日子里，你的状态如何？

**罗新：**我跟大家一样，最初阶段就是天天刷微博、刷微信，天天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种疯狂的状况也不可能持续很久，大概过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决心还是强迫自己每天只在很短的时间内看一看，其他时间还是应该看书，到再过一段时间就干脆恢复原来的工作，开始写东西。

我看的书跟自己这一阶段的关注的问题有关，也就是跟疫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我重新读了《瘟疫与人》，同时又读完了去年到处给人推荐自己却没有读完的《不平等社会》——这本书把瘟疫作为了改变不平等社会的人类有可能的4种方式之一。

**剩余价值：**我们也先后经历了被信息疯狂轰炸，到崩溃、情绪失控，而后是失语，再到现在逐渐趋于平稳的一系列状态。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了一种危险，即例外状态的常态化。

**罗新：**我们现在还处在伤痛边缘，还没有到最危险最可

怕的时刻，但是我们也知道，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几个月以后很可能很多人都不再记得今天的情绪和思想，很可能会很快跟过去重新衔接起来。

不过我说的这种情况更接近2003年的SARS时期，大概这次和SARS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这一次的病毒似乎打击更强烈、造成的痛苦更大，而且可能跟在2019年底之前许多人——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读过一定的书、又在做文化事业的这些人——的心理情况的发展有关。当然我们对失去的生命，对仍然处在痛苦之中的、前途未卜的人们感到伤痛，但大家说的“愤怒”主要不是来自病毒的直接打击，而是病毒间接地帮我们把另外一个世界的另外一面捅开了。从这个层面看，人们在此次疫情之后的心态会与SARS之后不同。

也许三五月之后疫情就会过去，但是历史上人类遭遇如此重大的非战争性、非政治性的伤害——以饥饿和瘟疫为主——之后，通常会陷入相当长时间的心理创伤时期。心理创伤会带来很多变化，在好多地方甚至已经形成了文化性的变化。那么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里面会怎么样呢？在一个国界已经不那么重要的当下，这也许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又会引起什么大的变化呢？就不得而知了。

**剩余价值：**您比我们年长许多，在您之前的经历里，有过与当下类似的心理创伤的感受吗？

**罗新：**我有过，但是是政治性创伤，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精神上比较成熟的时期。二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历的伤害很大，那是终身的。但这一次跟那种纯粹的政治上的打击不太一样，这种会更让人觉得，人怎么这么脆弱？社会怎么这么脆弱？我是读历史的，会读到很多类似的故事，但读书跟自己亲身经历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我过去会说，总会有牺牲的，人类的进步总是以牺牲为代价的。现在我就是这个牺牲——如果是我自己也许还不要紧但如果是我家里人，如果是我儿子，如果是我父母，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这么坦然地说，让他们牺牲，让历史因此得到进步？这一次我就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家人现在正面对威胁，他们就在湖北，就在武汉。

## 02

**强调“战时状态”，不仅给公权力也给地痞流氓开放了可能**

**剩余价值：**那么你最早得知武汉封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在现代城市管理中，封城似乎也不是一个会经常出现的决策。

**罗新：**（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全世界第一例，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过去古代发生某种瘟疫，都是在一些很小的聚落，当然都是残酷对待的。我没有具体地学习过欧洲这方面的处理方式，但是近几百年来我们留下的历史记录说，对于在中国发生的（瘟疫），都是把一个村庄围起来焚烧，但里面很多人没有得病，逃出来也都是当即被烧死。

你可以狠着心说，这个方式是为了让瘟疫不流传到更多的地方去。但是对 1000 万人口的城市实行封城，这太不可思议了。1000 万人，相当于三国时代全国的人口，更何况后来事实上形成了封（湖北）省，各个省甚至各个小区也在封。大概全世界能做到（封城）的国家也不多，因为在西方，在民主国家，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任何一个行政长官能够决定的。我们现在听很多人谈“战时状态”，但随便一个行政官员就能够宣布“战时状态”吗？这必须是要经过最高立法机构决定的。封城或者诸如此类的极端措施带来的伤害，一定会比病毒本身还要大。

**剩余价值：**我们就从封城这个话题过渡到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的语言危机。“战时状态”“战疫”等话语充斥，我们在一些媒体上也见到了“生产一线也是战役前线”“早日打赢这场硬仗”“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这类说法。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被提到战争状态，军事化用语激增，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罗新：**军事术语侵入日常生活语言的情况，当然由来已久，这恐怕是 20 世纪的特点。另外也和中国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当中，始终处在对内对外的战争状态有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国民革命还是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军事所占的比重都非常高，对军事文化的崇拜也变得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军事语言，而军事语言的侵入对整个文化的伤害或者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觉得应该改变我们的文化的话，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自我做起，少说这种军事性语言。我们有足够的语言和足够的词汇来表达我们的思想，用不着使用这些斩钉截铁的、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的军事语言。至于体制如何使用这些语言，它有自己的惯性，很难改变，但是作为普通人应该这种自觉意识。过去我们没有这种自觉意识。我在好几个场合说过这个话题，但是没有人有反应。可这次反应特别强烈，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机会，让人们意识到这种语言的空洞和危害。当你强调这是“战时状态”的时候，事实上不仅是给最高的公权力开放了极大的可能，也给那些地痞流氓开放了一种可能。我们这两天看微博上微信上传播的那些小视频，有人把在家里打麻将的人都赶出去游街。起码的法律都被破坏了，基本的人权都给毁灭了。为什么？因为在“战时状态”。因为我们在“战时状态”，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使用这种语言的危害性是极大的。

**剩余价值：**包括“毫不留情”（absolutely without mercy）这种说法，我们小时候其实也经常听到。哪怕是针对吐痰这种不文明行为，在标语上都显示为毫不留情地、坚决彻底地铲除。

**罗新：**坚决彻底，毫不留情，这些都是荒唐至极的词汇。他

们就相信自己能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人性，因为他们觉得人性在这时候可以做出牺牲。我封城、封闭小区，让大家都自觉地在家待着，什么时候你让我出去我就出去——如果人真的是那样的人，倒也可以这么做。但人不是那种动物，人跟别的东西不一样。他们理想状态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这是最理性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最有效的对抗病毒的方式就是隔离，这是医学，这是科学上的说法。既然如此，我们何不采取最有效的、最大程度的隔离，但是他们不知道，最理性的办法是不可能人间实现的。

人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是理性和感性共存的动物，是很复杂的动物，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不是因为计划经济背后没有科学道理，而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类，不是数字。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就容忍几千万人为了一个更大的目的做出牺牲，我们还做人干什么？我认为，人这个东西是最高贵的，哪怕死亡降到我面前，我内心的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去掉的。如果把那部分去掉了，我就不再是人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能不能够为了一大部分人牺牲一小部分人，以及这种牺牲背后是否有科学道理，都是很可疑的。

03  
现在的共产主义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民族主义

**剩余价值：**除了军事化用语，我们也观察到了大一统民族主义话语的盛行。《人民日报》关于洛杉矶侨胞捐赠物资的报道里提到，侨胞捐了物资之后没有留名字，只留下 4 个字：“中华儿女”。还有一些标题说，我们抗疫的组织体现了“中国速度”。作为一位始终关注和研究民族主义的历史学者，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罗新：**这次本来不涉及民族主义问题的，因为民族主义话题总是在灾难面前消退，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但是这一次民族主义重新冒了出来。一个表现是这次的日本捐赠。日本的捐赠物资附上了一些我们也许读过但日常生活中不熟悉的诗句，同时这些诗句又那么应景，所以大家都很感动。这种感动之下有对日本的好感、对日本的文化高以及心态好的表扬，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就消退下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开始追踪这些话想知道日本人是怎么知道这些诗句的。在发现有些诗句是在日本的华裔留学生写的之后，有人马上就亢奋起来，说：“你看，这些并不是日本人写的，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好像因为是中国人的写的，我们的颜面一下就回来了。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民族主义者前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受伤了，现在必须把伤口舔一舔，于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剩余价值：**最近有很多人把此次疫情事件跟切尔诺贝利相提并论。有一条微博说，最后挽救了苏联人民、让切尔诺贝利被重视和得到认真处理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有可能会毁掉整个欧洲，苏联是不能付出毁掉整个欧洲的代价的。于是在这种重大危机面前，其实是国际主义救了本国的人民。而在中国当前这个情况下，连国际主义都没有。不仅如此，中国作为一个所谓的大国的影响力，似乎体现在如何能够影响一个国际组织帮它一起撒谎。

**罗新:** 所以我觉得民族主义在这里面还是一个挺重要的面相。中国现在的共产主义已经和经典共产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你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 但我们说它其实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民族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国际主义, 强调的就是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是一回事。《共产党宣言》里说的最清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际主义很难搞民族主义, 很难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是最独特的、是优先的。在这一点上, 我对苏联的情况不了解、不熟悉, 但是我想至少在苏联的意识形态结构里国际主义占的比重是很高的——不管他在实际决策的时候国际主义占多大比例, 至少在意识形态里面, 在口号里面占比很高, 可是现在在中国, 国际主义没有了。即使在实际行为当中还看到大规模援助贫穷国家、非洲国家, 但这些不一定是出于共产主义的需要, 而出于其他考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很多代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缺乏对其他国家的人的那种平等的、尊重的、感同身受的博爱。

近代中国其实一直都有博爱的说法, 我们现在一点都没有。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绝对的爱, 爱都是有阶级性的——在 1949 年之后, 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些。博爱两个字被污名化了, 被完全破坏了, 自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国际主义了。在我们的文化、法律体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里, 人不是一个有权利的东西, 人是一个利益的单元。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受到威胁的时候, 当然要做出保卫利益的本能反应。但是必须要教育, 必须要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自己有基本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拿走, 不能破坏的, 是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的。

04  
“集中力量办大事”意味着所有功能的停摆

**剩余价值:** 从 2017 年年末开始, 权利被拿走被破坏的情况一再发生。从自己的住所被破门而入, 到因无法回到出租屋而被驱逐, 我们好像一直都处于一个被剥夺的状态, 包括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安全, 即便是看病, 也是有关系有特权就有床位。很多我们所信奉的东西完全失效了, 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 最后的结论就是我要买自己的房, 我要买自己的车, 我要变成有特权的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李文亮去世让大家的情绪达到了一个高点, 就是你始终是一个被剥夺的人, 然后现在有一个被剥夺的人作为一个牺牲者, 死在了他受剥夺的起点上。那天群情激奋, 大家都说我们今后就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人, 如果不能说真话我们就不说, 但这样一种美好的良善的愿望能实现吗? 当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抗争、怎么去奋斗, 去争取我们说真话的权利?

**罗新:** 所以我在微博里说, 天亮之前会更冷更黑。也就是说, 你以为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了别人, 别人和你一样愤怒, 别人和你一样的情绪有一样的认识甚至有一样的决心要改变, 但是接下来面临的情况可能会让你很失望。这些人的声音

你再也听不到了, 这些人的脉搏你再也感受不到, 你可能感受到的是来自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的压制。

很有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许不会是短短的几个月、一年、两年, 而是相当长的时间——是更黑暗的, 是更糟糕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写“一生所学、只为此刻”? 就是等, 在这个时刻你怎么度过? 对我们的考验在这里。

**剩余价值:** 从愤怒到真正的行动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罗新:** 对。在现代世界我们怎么行动? 在现代体制下, 个人或者没有很多资源的人怎么行动?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除了争取自己做一个干净的人之外, 很难有别的行动。直接的街头政治时代, 恐怕已经过去了。连小区的管理都如此网格化、如此极端, 一个大的人群做什么行动真的很难了。但是我们这次已经看到, 这样的—一个体制应付不了任何危机情况, 而危机的情况并不来自我们上街去游行。

**剩余价值:** 它可能应对的最好的危机情况, 就是大家上街去游行。这个事情也会让我们看到治理里面有很多不均质不平衡的地方。过去我们认为, 你的信息对于管理者来说完全透明的, 你买火车票飞机票都有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 甚至你上车还有人脸识别。可为什么当一个列车上出现疑似感染者的时候却无法找到他? 原因就在于, 这些信息是掌握在治安系统里面, 而不是掌握在卫生系统里面的。而卫生系统想要调动这些信息要走一个漫长的手续, 这个手续甚至长到还没有发一个微博有效。

这挺让人绝望的。我们上交这些信息、让渡这些权利, 本来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更好地被服务和被保护事实上完全相反, 当我们需要被保护的时候, 这些信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罗新:** 系统不是没有用, 系统是做单一用途的。这其实就是周雪光教授在访谈里说的, 当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时候, 地方反而瘫痪了。他们有那么多资源, 却调动不起来。权力只有一条线索, 权力本身是集中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上面一根线一收, 底下的线全都绷着朝上, 横向的东西没有了, 而社会真出问题的时候需要横向的力量。

**剩余价值:** 我们国家已经没有社会了, 因为它长期抑制社会的成长。所以这次我们就会发现, 武汉一开始在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 志愿者是可以组织起来的, 他们其实构成了整个城市物资运送的毛细血管或者通道, 但是他们可能受到的阻力恰好是来自政府的,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

**罗新:** 我们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总是不容易被充分尊重。越是到现代社会, 我们社会的各种功能越是丰富。但是当权力、资源、决策过于单一和集中的时候, 当我们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 就意味着所有功能都要停摆, 这是现代社会承受不了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小村庄, 大家这一天晚上都不吃饭, 都来做同一件事, 是可以的。但在这么复杂的现代社会里, 一旦某些功能停摆, 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当媒体不发达或者媒体被管控的时候, 这些伤害是看不到的。比如武汉有那么多透析病人现在不能做透析了, 比如一个妈妈带着自己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在大桥上哭, 这些人的利益全都被牺牲掉了。他们都跟病毒没有关系, 他们不是携带者, 不是有危害的人。他们应该获得同等的尊重, 这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本质。



**剩余价值：**李海鹏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大概就是说可能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又会称赞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控制住了疫情。一个举国体制的隐患到最后可能变成了一个举国体制的胜利。

**罗新：**历史学者认为，在西方，你看到所有的战争、灾难性的革命或者是体制性的崩溃，其后果可能是引起了一波新的历史上升期。比如美国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经济反而有所回升，反而开通了一条向上爬的新的道路。但是研究者也发现，在东方不一定是这样，灾难之后可能是更大的灾难，更大的灾难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引发灾难的那些因素不仅得不到修正，还得到了强化。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人们说，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该不该反思了？要小心，可能没有反思，可能是强化。

05  
饭圈话语泛滥、低幼化与资本逻辑

**剩余价值：**除了军事化用语、民族主义用语之外，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次疫情当中饭圈用语在社交网络上的弥漫，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雷神山医院的直播。最开始大家可以在央视网上面观看雷神山建医院的一个实况直播，后来就发展成很多人一边看一边发弹幕，给每一个叉车和推土机都起了名字，然后给它们打榜。有人批判说，工地上分明有真实的人，有真实的劳动者，但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权益——他们是不是拿到了工钱，他们有没有被感染——反而去关心叉车。当时有一条微博被转发了几万次，说的是这种低幼化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现象。精神分析认为，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专断的、自恋的父母，你的小孩就容易变得低幼化，因为父母一直不想让他长大，一直要巩固对这个孩子的控制权。在这次疫情期间，一些人会把新冠病毒称为“阿冠”，或是把武汉称作“小笨蛋”，把一切疫情的事实用一种给小孩子讲故事的方式和口吻讲出来。一方面，这确实是一个低幼化的问题，因为这类话语的本质是把一些可能有潜在伤害的、有危险的东西无害化；另一方面，它背后粉丝打榜的逻辑其实还是一个资本的逻辑，是很长时间资本所驯化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情感模式——我喜欢你，支持你，给你打钱。这个模式可能是更强大的一个动因。罗新老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罗新：**没听说过。

**剩余价值：**这种语言背后的逻辑是非常可怕，它事实上就是把国家实体化为一个偶像，然后让本来应该是国家主人的人民，变成了国家的粉丝，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叙述方式。而且这样的叙事也不限于孩子之间，它是一种成人之间的低幼化交流模式。这种低幼化的形式又更容易招募一些年轻的群体，这也可以关联到我们刚才聊的语言现象——军事用语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语言，饭圈用语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简单粗暴。它可能看上去更萌、更无害，但传达出来的是很绝对的、很简单的，甚至是抽离了最核心的思想

和最重要的东西的这样一种话语。一旦这样的话语被习得，就可能会改造你的思想、影响你的行动。通过和年轻群体接触——比如在微博上看到他们的留言——我也会发现，在中国成长的小孩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接触太少了，基本上成长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对社会的理解真的是来源于一种意识形态教育，而不是真的在社会上生活过，然后从他的经历当中学习到了这些。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否认这是一种天真，但是一种被利用的天真，是被国家征用和收编的。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国家又很机智。

**罗新：**这样的机构都知道找什么样的人，比如说希特勒就知道不能找大学生，不能找大学教授，这些人都是应该被排除在外面的。他要找什么人？找中学生。一般都找初中生，十二三岁、十四五岁的人是最有希望的，所以冲锋队培养未来的领袖都是从这个年龄开始培养。

06  
每一代人都很了不起，都会有办法获得自救

**剩余价值：**我们的另一个观察是这次疫情期间个体叙事的崛起以及它的重要性。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层面的叙事的撕扯和张力，一方面是治理术层面的，是国家机器将人口作为整体的一种控制，是牺牲一部分人去保全另外一部分人，是夺走一部分人的生命来保护另外一部分人这样的叙事。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在微博肺炎求助者超话里面，甚至在豆瓣、在朋友圈都可以看到个体的呼号和呐喊，个体家庭的支离破碎。这样的叙事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并且这个叙事在李文亮去世那天晚上达到了一个制高点。这是一个情绪的高潮，大家看到，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因为说了真话，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下场。我们每天看到的是数字，是转化“存量”、新增病例和治愈人数，已经有一点接近麻木的状态了。但这样的个体叙事其实让我们保持清醒，不要麻木，让我们知道在肺炎中普通人和个体所付出的代价。

罗新老师之前在微博里面也有说到，“中国古典文明的新生，必在发现或者重新发现个体人。”您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也会有一个向个体的转向，所以我们会好奇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罗新：**这当然不是最新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在 SARS 期间，在 2008 年汶川地震期间，都可以看到好多非常个体化的、对个体受害人的，以及在灾难当中个体表现的描述。但是没有这次这样密集、这样好，而且不再以表彰、以歌颂为目标，就是要写出人在这个时刻的特质。

这反映了这十几年来一代新的记者、编辑训练自己的结果。他们的写作显然不同于过去的写作者，不同于我这一代人和比我更老的人，现在人的观念已经变了，写作方式已经变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非常棒的、过去可能在中国的文献里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多的关于在灾难面前普通受害人个体生命的描述这些人既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也没有什么大的、



值得表彰的功绩，但这样的生命值得被尊重，这是中国文化的新生希望所在。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样，并且以后还能做到这样，那就不在乎什么独裁者、什么体制了。真正能够改变中国的就是这些东西，只要能够从这一点意义上改变，中国就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们要记住一点，每一代人都在说现在的孩子没救了，在我上学的时候，77届、78届的人就说，你看80级以后的都是什么人，今后的中国怎么办。到我这一代再看，我跟我儿子一起读书，很多东西他读不懂，他不知道磨盘是什么、碾盘是什么、镰刀是什么，既不知道也没见过。在这种情况下，你往往会觉得，下一代人怎么办？其实没有关系，每一代人都很了不起，他们会有办法获得自救的。人的本性里有自我教育的一面，当然人的本性里有被愚弄的东西，但也有会挣脱谎言的这一面。

相信人很重要。而相信人，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首先，人不是抽象的人，人都是具体的人。其次，人是没有边界的人，在中国的是人，在另外一个国家的也是人，跟我们一样的人。人都是一样的，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魔鬼也好，圣人也好，都是人。注意到这一点很重要。希望从哪里来？就从人身上来。

自古以来有一句名言，有人的地方就有希望。就是说，你不要看现在的小孩那么傻，说那样的蠢话，没有关系的，他们将来也会变成跟我们差不多的人。当然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就像他们的父母有责任教育一样；但是他们自己也会有办法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也找到了办法自我教育一样。

我们小时候的愚蠢荒谬比现在的小孩要多，文革教育出来的孩子都是那样的人。我上大学的时候，听到国歌和国际歌，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听到“民族”两个字的时候简直激动得不行。所以，他们也会找到自我救赎的道路的，因为我们都是人。

**剩余价值：**我还有一个追问。2017年你接受“界面文化”采访的时候提到，我们现在总是强调自己跟他人的不同，或者这一代人跟下一代人的不同，但其实你要去发现他们身上相同的点，比如我们一样都是有感情的人、都是有希望的人。那么您觉得共情是可以向上共情的吗？您说的这个人与人的共情，更像是同为被压迫者之间的一个共情，我们能够跟官僚体系内部的人共情，甚至跟极权者共情吗？

**罗新：**我们学历史的人，学到的都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都是帝王将相。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中，一定都是整天被人删贴、被人封号的悲惨的人，是根本不会被写到史书里的人。历史书里边都是体制里面的人——不管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但是你会看到，其实这些人跟我们也差不多，他们也在挣扎当中，在struggle。

**剩余价值：**但如果达到了这个程度的博爱，我们还能够从愤怒走到行动吗？

**罗新：**捍卫人的利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行动。当我们相信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接受人所有的东西，而是说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够让渡。你封我的号，我就是不高兴，我不能因此变得高兴起来。我的基本权利被侵犯，我就是要反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同时，你要相信别人也都是人，我们不能够因为我的奋斗就解除别人做人的权利。

# 长安十日

江雪

社区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一遍遍重复着，喊人们下楼做核酸。队排了很久。测核酸的女生，每做完一个，都使劲地用消毒水拍打着自已的塑胶手套。我闻着那冰凉的气味，想像着她的手已冻成青紫。

这是 2021 年 12 月 31 日。旧年的最后一个黄昏，暮色即将降临。从阳台上看上去，大街上空寂无人。这城市不再有车水马龙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荒谬而又有一丝恐惧。

## 01 封城当日

12 月 22 日下午，西安封城令宣布当天。我闷着头在南郊的家里编稿子，隐约感觉到疫情变得严重。家门口的一些餐馆几天前就被贴了封条，门口的便利店前一天已不再接快递，生活开始不方便。三点多，朋友随喜微信留言，说还是去买些菜吧，储备一些食物，马上超市都要关门了。我相信她，她是资深的公益人，有多次远程救灾的经验。于是立马出门。

到超市就发现情形不对。虽然当天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召开，傍晚的大抢购还没开始，但人们的购物车都塞得满满当当。我决定多买一些，共用单车是驮不回去了，最后还是用车载了回去。

果然五点多的新闻发布会上，下了“封城令”，虽然政府说“物资供应充分”，但人们已开始抢购。我因已买好东西，心里比较笃定。忙完了，出去转转。路上看到，高新区的沙井村村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整个村子外面，沿路边有两三百米，都已被绿色的板子隔了起来。

从天桥走到路对面想看看详情，这才发现，有一家正在营业的商店，也被隔在了挡板里边，暂时还灯火通明。我站在天桥的台阶上，和老板打招呼。他告诉我，下午紧急封村，商店过一会儿就得关门了。

村口聚集了上百人，人们都戴了口罩，摩肩接踵，没有其它防护。路边，有一辆警车，闪着灯，车上没人。

一个年轻女人，买了一堆东西，塑胶袋胡乱放在地上，正蹲着给家人打视频。一个中年男子，靠着自行车，发愁地看着人群。他告诉我，早上他出去干活时还好好的，晚上八点下班回来，就发现村子封了，进不去了。他告诉我，一个月的房租是 500 元。

我知道那种房子。20 年前刚毕业，我就住城中村，大约 10 多平米，没有卫生间，在楼道里做饭，采光不好，黑咕隆咚的。

两位清洁工，手里拎着塑胶袋，大约也是买了点生活用品，站在人群里，黄色的保洁服很显眼。问他们，说是下午四五点出去干活的时候，还能出来，晚上干完活回来，就进不去了。很多年前我做过保洁员的报导，知道他们租房，只能在城中村，因为他们有推车、扫把等工具，就算租得起楼房，也没法住。当年报社附近的黄雁村，就是保洁员们的一个聚集地。后来那里整体拆迁，盖起了楼，他们也就失去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陪他们站在路边，感受着他们的无奈。年龄大的一位很胆小，生怕说错了什么。年轻的那位，却始终笑着，对我不时点着头。口罩后是黝黑的面庞，我能感受到他笑容的温暖。一忽儿，隔离板介面的地方，人群一阵骚动，似乎开了一条缝。听人们说，现在村里的领导正开会，还在等说法。两名保洁员也赶紧凑了过去，一会儿又失望地散开。看看手机，已将近晚上十点。人们聚在这里，在寒风里至少已等了两个小时。几天后，看到网上说，住在城中村的一个年轻男人因封城吃不上饭，饿得大哭。我就想起这个封城夜。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也住在有几万人的沙井村，也曾在那一晚被堵在村外、一脸茫然。

又去了几个地方，然后回家，此时大街上空荡荡。吉祥路上，俗艳的红灯笼挂满了路边的梧桐树。有人站在路边，拎着大包小包。高新路上，骑摩托的外卖小哥小吴正赶着送零点前最后的餐。他说，虽然封了城，人总要吃饭，商场里的一些餐馆应该会开门，会有单子跑。说话时他还笑嘻嘻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这个夜晚，那些被堵在家门口的人，超市里抢购的人，孕妇、病人、考研学生、建筑工人、城市流浪汉、路过西安的旅游者……可能都低估了这场“封城”将为他们带来的灾难。

而那些为这座城市按下“暂停键”的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他们又可曾想到，他们将怎样影响居住在这城市的 1300 万人的命运？如果这不是比天还大的事情，那还有什么是什么呢？

## 02 残存的市场

至少在封城之初，一切似乎还说过得去。很多社区门口的超市、蔬果店，遮遮掩掩都还在经营。虽然人们的流动已停止，但基本的生活供应还在运转，不过慢了许多。

我所在的社区，院子里每两天做一次核酸。大门虽不能自由

进出,但物业开个“出门证”,也就是一张小纸条,就能出门。据说隔离政策是“每一户两天可以有一人出去买菜”。

我并不需要外出去买菜。一来还有储备,二来社区旁的便利店还开着,勤快的老板娘隔着栅栏记下大家的需要,不管是蔬菜米面油,还是生活用品,配好货,再递进来。12月25日,下雪了,有蔬菜车停在了社区门外,菜很新鲜,还有鲜肉,邻居们自觉地排队去买。一位女士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抱走了自己订的一大束鲜花。

没有人能预料到,仅仅过了两天,全西安人都开始在网上找菜全民买菜难在这样一个物质过剩人人却要减肥的年代,吃饭会突然成为一件难事。

12月26日,封城后第四天。在网上看到消息,说大家最近都在关注的湘西田田老师回家了为田田老师高兴的同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的律师朋友,他的妻子,此时也在网上呼喊,盼着丈夫能回家。但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心头憋闷。我决定以买菜之名出去转转。

拿“路条”出了门,在积雪未融的街道上扫了辆共享单车,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大马路上,公车还在跑,但并没有人坐。某个月台的躺椅上,躺着一位流浪者。大街上,不时掠过外卖小哥、快递员的身影。

路上警车不少。出来十分钟,大约看到四五辆警车。

平日经常去买菜的甘家寨村口,用挡板遮住了。板上贴了好几张纸,歪歪扭扭写着“调料”、“辣椒”、“榆林豆腐”、“土猪肉”字样,都留了电话。有两个男子,就隔着挡板,一手交货,一手扫码付帐。

这是一个庞大的城中村安置区,也是周遭一个著名的集市。每到傍晚,村里灯火通明,红尘万丈。好几个快递公司的服务站都设在这里。和周边社区相比,这里衣食住行,自成一统。虽然封城,但村里的好多小餐馆还开着。此时,社区的围墙外站着一溜儿外卖员。不一会儿,就有餐馆的小老板匆匆跑过来,隔着栅栏把待送的餐递给他们。

一位外卖小哥正坐在摩托车上玩手机我和他聊了一会儿。小哥姓刘,今年29岁。老家在宝鸡。他说,22号那天听到要封城,想赶紧回老家,结果一问,回老家就要集中隔离,隔离费还得自己掏,一天得210元。太贵了,他决定还是留下来。但他租住在沙井村,村子已封了,他也回不去。

没办法,他就住酒店,因为这样可以自由进出,还能继续跑单。而大街上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每天150元,他和人分担。这些天,开门的餐馆少了,单子少了,但外卖员也少了,所以他每天还能跑三、四百元,甚至超过了他此前的日平均收入。几天后,看到新闻,老家在咸阳淳化县的一个男人,封城后,为了从西安回家,蹬了一辆共享单车,在零下六七度的关中原野,从晚上8点骑到早上6点,将近90公里,在接近老家时被防疫人员“抓住”了,罚款200元。还有一个年轻小夥,为了回家,从咸阳机场走到秦岭,又在山里走了八天八夜,一直到了分水岭附近的广货街,被人发现。

我又想起了小刘。不知道后来“管控升级”,他还能出来吗?即使能出来,又有单可跑吗?一天150元的住宿费,他又怎么承受?后悔那天没有留下他的电话。

03

管控升级

12月27日,突然听说全西安“管控升级”了。社区保安说,原本执行的“两天出门买一次菜”,已经作废。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进出社区。

28日,全网都在呼吁“买菜难”。我所在社区门口,大门紧锁,物业的人不再让大家在门口停留,在栅栏内登记买东西。我扫码加了门口便利店的群,这才发现,这可能是我接下来唯一可依靠的生活补给管道。

后来想想,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那外面物资再丰富,宣传再好,其实也和普通人没了关系。

便利店的群里一片混乱,已有400多个人。人们都在找吃的,抢吃的。老板娘规定,每天“接龙”只能限于早上一个小时,但每个刚进来的人,都要先抢接龙一番,自然被老板娘一顿训斥。翻了翻群里资讯,看到社区里有年轻人在求助:“谁能卖给我一幅碗筷?到处都买不到。”我留了话,让他十分钟后在楼下取,然后给他收拾了碗、碟、筷子等一套餐具,送了下去。隔着绿化带,问了一下小夥子的情况。小夥说,家在附近,公司在这边,封了后回不去,但办公室从没有开过火,所以啥都没有。他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炖锅,但又没有餐具,也没地方买……作为感谢,他带给我一点零食,包括一袋鸡肉肠,一小包士力架,还有一盒特仑苏奶。

第二天,情形更糟糕。看到群里有两个人年轻人说,已经吃了一周泡面,嘴都烂了。一个说,她现在所有的库存,只有两包速食面。另一个说,自己已“弹尽粮绝”。

我留言给两位年轻人,说第二天中午,我给他们送一顿盒饭。一位谢绝了,另一位答应了。临睡前,我取出了冰箱里的一块牛肉,想着第二天给这位姑娘做番茄炖牛腩。没想到,第二天她留言,说自己有吃的了,不用给她做了。再三邀请,她还是说算了。猜测她是因为自尊,或者还有一丝戒备,就没有再强求,只告诉她,有事可以和我联系。

我也开始数着自己的库存过日子。看到邻居说天天做油泼面,为了省菜。就送去了四朵香菇,两个番茄,一个西葫芦。再加上一桶我封城前买的啤酒,挂在她家门口。她挺开心,回赠我几个甜脆的苹果,我求之不得。

此时,看到网上说很多社区,邻居之间开始“以物易物”,拿速食面换香烟,大蒜换土豆等,哑然失笑,但我相信,这当然是真的。

突然进入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人也开始对食物计较。我老想去厨房看看,清点一下冰箱里的存货。封城已近一周,提前采购的食物,也少了一大半。想着再补给一些,但在便利店的群里,根本接不上龙,很多人说自己已在饿肚子,等吃的,央求店家能早点配货。我决定不去凑热闹,另谋生路。

04

人们的自救

从12月28日到12月31日,至少这四天,关于怎么买到

菜以及生活必需品，也就是如何能吃到饭，大部分西安人只能依靠自救。

有外地的朋友好奇，问快递能送到吗。事实上，在 12 月 21 日左右，西安的快递已停，人们无法从外地网上购物。封城后，微信群里流传着一些网购平台，称疫情期间可以送菜。但我下单才发现，只要住在西安，就无法配送。平时常用的“盒马”，永远是“快递小哥已约满”。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人乐到家”，下单买了些菜，但付帐后两天，还没有动静，也就退了。

12 月 29 日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直播,评论区被买菜难攻陷，结果干脆关闭了评论。

我和几位朋友在一个志愿群里讨论。他们都参与过各种救灾，经验丰富，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次在西安，要做点事，实在太难了封城之初他们就组织了线上线下一千多名志愿者，但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了所有社区，通行证又非常难办，志愿者根本没法离开居住地，到一线服务。这也是他们多年来都没有遇到的情况。

其实很容易想到，我们这些社区居民还是幸运的，家里一般都会有点余粮，不至于马上挨饿。最悲惨的是老旧社区，城中村、建筑工地等一些“三不管”地带的人。难以想像的是，那些平日在公司上班的年轻人，封城后也成为吃饭最难的人群之一。他们平时不做饭，没炊具，有的就住办公室。此时外面餐馆关门，外卖停止，连大门都出不去，速食面都成了稀罕物。

12 月 30 日晚，气温零下。在一个小群里，朋友留言，刚在街上给流浪者送完餐回来。这位朋友热心慈善公益，与人合作，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为西安街头流浪的赤贫者提供食物。这几天，他在南郊的工厂为流浪者准备食物，然后送去城里，一晚上送了 185 份热饭菜。他因有通行证，倒没有什么阻碍。

封城前，我曾参加朋友的活动，给流浪者们送过一次棉衣。知道他们平时主要在市区的银行、ATM 机下等地方避寒过夜。如今封城，他们一方面被驱赶，另外，因为街道上没人，不管乞讨还是拾破烂，都没了条件。对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冬天。

元旦这天，我和好不容易有点空闲的张姐聊了会儿天。她做公益机构已 10 多年，原来为残障者服务，近三四年投入社区工作。这次疫情，她一直在和社区合作，连结资源，参与了很多救助活动。

张姐告诉我，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孩子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邻里互助完全可解决。包括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在这块儿，原本公益机构可以做很多事，在社区耕耘建设。但这一点，往往又被政府忌讳。

说到目前到处买菜难的状况，她比喻，类似于把大家全圈起来，再由政府工作人员去“投喂”，试想在上千万的城市，怎么可能实现？一个社区有两万人左右，基层工作人员一般

不超过十个，光各种行政指令都忙不完。她感叹说，认识到的社区工作者，以年轻女性为多，很多也都是母亲。这些天她们根本回不了家，都是超负荷运转，很多人就打地铺睡在办公室，让她都觉得“心疼”。

“政府还是没有认识到，行政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这次防疫，基层工作人员这样没日没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聊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小时。

05

我们的建议

12 月 31 日上午，我终于买到了疫情以来的第一箱菜。说起来还是通过邻里互助。我在社区微信群里看到卖家的海报，发现价位比较合适，108 元一箱，一箱 20 斤。赶紧下单，第二天就送到了，还挺新鲜。

此前，网上已曝出不少新闻，政府的免费菜发到了一些社区，但网友追查，一些自称保障丰足的社区都和政府有关。与此同时，住在曲江的朋友开始收到“爱心菜”，不少人开始发“正能量”。但我的判断，即使政府送温暖，一时半会也到不了我们手里。道理很简单，市场停摆，全市日常的物流配送都停着，1300 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短期内送菜上门，可能吗？

取到菜，问了老板两句。老板说菜是从宁夏调来的，调了 5000 件。因为前些天办不下通行证，没法送。只要社区的需求在 5 件以上，他们都愿意配送。“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这是句老话了，此时此地，我才能感同身受。

事实已经很明显，持续多天的“卖菜难”，本质还是人为灾难。在西安，并不存在物资匮乏，只是物资难以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里。看到很多自媒体文章，有一篇，作者叫兽爷，一语中的：“我们有天猫、京东等那么强大的物流系统，政府为什么不用？非要自认为聪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门？”

天天看着朋友圈，微信群，内心被各种资讯轰炸。随着管控升级，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高危孕妇无法去医院备产，肾移植后急需用药的病人无处买药，农民工在关门的建筑工地上无法吃饭，考研学生滞留街头挨饿……因防疫管控而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再下去，并非没有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

12 月 31 日，一早和朋友们聊，讨论该怎么办，和随喜等朋友形成了一些建议。我决定，以市民个人的身份，先把这些建议发出去。这份“西安一位市民关于解决吃菜难问题的紧急建议”中提到：必须逐步恢复市场秩序。首先恢复末端物流系统，让菜贩、果蔬店、超市等能进入社区供应，包括让各种救命药品进入居民手中等。并且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救助系统，鼓励民间自救等……

最后，还是决定不署名，为的是不被贴上“标签”，只让市民的心声能表达出来。但天知道，我心里是没有恐惧吗？朋友敏涛前两天写了几篇日志，就是呼吁解决“卖菜难”的，文章发出两天，就找不到了。我熟悉的一家平台，已开始删掉西安疫情的所有“负面”…



06  
“西安只能胜利”

2022 年的第一天到来了, 一大早, 拉开窗帘, 晨光熹微, 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  
我拿起手机, 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 随手点开一个视频, 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 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夥子, 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着殴打。  
画面上, 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 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 面对自己的同类, 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

人, 怎么能下得去手? 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 也会让人变异吗? 是在有权者眼里, 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 我默默关掉了手机, 此时此刻, 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 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这城市表面的寂静掩盖不住它的兵荒马乱。从个体角度来看, 从 12 月 27 日以来, 几乎每一天, 都有灾难发生着。最初是各种吃不到饭, 后来更多的是关于治病就医的呼救。我过去呆过的报社, 成立了一个“记者帮”的栏目, 希望“帮一个算一个”, 记者去帮市民买药送药, 解决一些实在过不了的关口。每一天, 收到的求助资讯有上千条。

# 孩子们的街道

李海鹏

夏末的一天我家停过一次电，恢复通电的那一刻，我的房子像一艘行将解体的船一样吱嘎作响，电器在各个地方发出苏醒的声音，打印机弓簧齐鸣，轰轰烈烈地运转了一通，吐出了一张白纸。这一刻，恰是对这个夏天的比喻。约瑟夫·海勒的话是另一个。他出生在纽约的科尼岛，成长在常以随意的态度道出可悲真相的 20 世纪，他回忆说，**科尼岛对孩子来说是美丽的，而对成年人来说是丑陋的，在这一点上，它常常是生活本身的写照。**在这秋意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像灯光一样被点亮的时刻，要描述刚刚过去的夏天予人的感受，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

我不免时时默念这句话。因为这个夏天，我恰好常在孩子们身旁。既然疫情着实严重，幼儿园长期停课，我们邻里之间不得不成立了一个带娃互助小组，于是每周一次，六个孩子会在我家度过一个白天。在别人家里，他们烘焙小陶器，玩乐高，做室内运动。跟着我，他们鼓捣显微镜，学习东北话和性别平等，拍摄父亲节的黑人祝福视频。我们共度了十来个相当欢脱的夏日。

我向来是小孩子们的粉丝。别人移情和投射到明星身上的，我移情和投射到小孩身上。我尽量待他们如待成人。而每当傍晚时分，他们兴奋地喊叫着跑向外面的街道，我也回转到现实中，如梦方醒。

这个夏日的丰美繁盛，不可思议，一如既往。暑热炎炎，我发现自己半是冷静舒适，半是跟喝了一杯似的，陶陶兀兀。说有些疯狂、分裂，也无不可。除非，疯狂分裂的是这个世界。我读过的某些句子，触景生情，在耳际砰砰炸响，尤其是在黄昏，看着孩子们奔来跑去、嬉戏不停之时。看着他们，我简直入迷，也许面露忧虑。他们骑自行车，20 吋 7 速，狂奔又突然刹停；玩滑板，勇敢地双脚上板；玩轮滑，画葫芦，过桩——这六个，都不到六岁，让我不由得大为钦佩——永远满头大汗。就连最小的那个，3 岁半的邻家女孩，也在疾速狂奔的单板车上故作漫不经心地瞟向我，暗自得意。我不得不每天赞美她几十句——我很乐意。世界在冒烟，像受伤的船。而孩子们永不疲倦，跳跳杆的笃笃声持续到夜阑人静。他们，像我曾说过的，像法拉利。

他们铮亮。而我，身为耆老，如一块锈迹。我像他们这么大是什么时候？昨天岁月是种天灾，在 4 月末幼儿园停课之初，孩子们的新自行车还嫌大，到 7 月初复课，他们中的三个已经掉了两颗乳牙。

他们都有牙盒，以为自己的牙价值连城。我小时候，牙都扔到屋顶上。如今的屋顶对牙而言太高了。

初夏干旱，我吃樱桃和草莓。天气庄严又温柔，仿佛 1982

年某天，鼓乐队里的某个跟屁虫，为了炫耀，在放学路上吹响了军号。在我日渐苍老的心里仍有一个青少年不时追问：你可曾见过如此美好的夏日？随即情势陡转，天色如漆，雷雨阵阵，蔷薇一次次被打下黄弱的小叶子。生死更迭，不事稍停。**何草不黄，何日不行。**天空似河水翻涌。小区居民曾被指令进行两次共 6 天的集体核酸，在干旱时期。人们排着长队，拉开安全距离，是烈日的炙烤和众人的沉默，让画面显得空旷。孩子们也对着棉签仰起了小脸——他们的小脸，在彼时彼刻，稍加端详，会让你突然忧虑得喘不过气来。雨歇之际，儿童自行车碾过水洼，抛出道道晶亮的弧线。

排队的队伍里，自然，多数人比我年轻。对于一个滞留着班里最小的孩子的记忆的人来说，殊为异哉。

如今的阳光让人耳鸣。一切都是亮闪闪的。屏幕在夜里也夺人眼目。不过，在我的眼底依旧留有一间古早年代的书房的残影：一张两头沉的写字桌，一种发霉的色调，一个裸露的灯泡，像桔汁在滴下。窗外的树叶瑟瑟抖动，可见安宁只是偶得。在这荒诞的残影中有着真实的事物。

回顾往昔，不无遗憾——这一点，恐怕代代皆然。**直到垂垂老矣，我仍会悔恨于青春岁月中那些虚掷的夜晚。**这是叶芝的话。年轻时我记住了它，又没有记住，如今则像一只笨熊，站在溪流中央，徒然想逮住每一只跃出水面的鲑鱼——一书——咔嚓咔嚓吞下。我的确不停地买书和不停地看。生命是彻底不够用的，而我又携带着将要消亡的某些东西。这种幻觉，让人紧张。

六月，弹窗让我吃了一惊：眼药水？眼药水。于是我拜访了居委会，填了表格。如今我已天下皆知——起初是在医院，扫健康码和行程码之后，还要填表，它们因此了解了我的各种信息，再后来——传染的是什么——任何一家饭店都了解了。我的十个手指已经不够数自己见识过的新世界在这个夏天，我又目睹了它几乎每天都刷新版本。也许你还记得上海的那些影像。医用防护服，闪着耀眼的白色，配有浅蓝色线，化为一片景观的潮水。我记得轮检——用的不是这个词——划区，记得食品配送、“团长”、封门闭户，还有人群合唱。也记得“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还有一个经历着精神眩晕的街道领导的喊叫，“你是我的臣民！”在那种前因暧昧而后果锋利的抓马气氛中，老克勒们依旧骄矜，下楼做核酸，要穿三件套。奇幻感，一波接续一波。我盯着手机。似乎我喝茫了，或者我是一只乌鸦，透过锁孔窥视着这一切。又也许，你不记得了。**没有残渣残留，就像一颗玉米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来自于乔治·奥威尔。现实依旧密不透风。一切神奇又枯燥，新鲜而老。

雨日，樱桃树是雨的银行。晴日，像集束炸弹坠下，壳斗迸裂，橡子滚落一地。我不免思忖自己是否已疯。我冲冷水澡，审慎思虑。确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这新世界对我有利，我却不甚欣喜。

五年前，我感受到了某种气候变化。到了算账的时候了。而一旦回到书房，我立刻就躺倒在沙发里，倍感舒适。没关系，这就是开始。当自己的处境不算顺利时，我并不期望外部世界而非具体的别人，会更顺利。细节地，我不期望小区的车库里塞满新的奔驰大 G——来自邻里的成功指针的压力；宏观地，我不期望经济活动的电钻继续火星四溅——显然那将助长市俗的贪婪无度和无知者的傲慢自大，带来更多网络时代的破玩意，更多的反文化。一己之私令我期望自己赚不到什么钱，别人也赚不到。我总是天遂人愿，于今亦然。风口的飞猪侠们砰砰落进了冰缝。奔驰大 G 们不曾到来。时代的变幻，恰好吻合了我这个魔法师的隐秘又黑暗的欲念。可是我不甚欣喜。因为我忧心忡忡，感到一个**对孩子来说是美丽的世界**，像薄脆的玻璃，令人担忧；而对**成年人来说是丑陋的世界**，像——什么都不像，除了现实——令人只想掩鼻而过。

\*\*\*

我已经很久不曾想起《永别了，武器》的开头了。即便对我来说它也过时了。**夜里我们看得见炮火的闪光**——什么人会忽略这个句子？对 20 世纪的男孩们来说，这种美和经验，令人心潮涌动。当然，还有，**那年深夏，我们住在村子里的一幢房子里，看得见与我们隔着河流和平原的群山。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泓蓝色。部队打房子边走上大路，激起尘土，洒在树叶上，连树干上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

暑热之中，保守派控制的美国最高法院，以天父降临式的风格，反对堕胎，又威胁到新闻业的准则。特朗普撒下的毒丸。文明世界就像一个小孩子看着 mm 豆在手上融化。一位生活在美国的女性朋友，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在朋友圈里引用了昆德拉用过的小故事。移民官问一个人，要移民去哪儿，给了他一个地球仪，让他选择。那个人查看了之后，问，“你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昆德拉 93 岁了。我读了一本他的传记，内容几乎没有。存在主义的遗珠，依然存在。太棒了。一位上海的朋友，新闻业的遗民，55 岁，则在六月底死于心肌梗塞。他的追思会，我没有参加，也许颇有声势，以至于我看到一位知识分子嘲讽地说，新闻界的人，大势已去，还在自以为是。我没有引用原句。再直白没有的势利眼，如今也被允许了。让新闻业的消亡成为事实的，不是它的消亡，而是没有任何替代物。互联网曾许诺了先进的替代品，但只是在承诺它一窍不通的东西而已。这一切，甚少激起谴责。人们更喜欢谴责失败的家伙们还相信自我价值。

在孩子们处于林间的“秘密基地”，被蚊子咬，就像被一柱柱香火抵住皮肤。这个夏天我可能被咬了两千个蚊子包。孩子们被给予一项特权，在我的蚊子包上按指甲印。“那你为什么总穿短裤？”一个孩子问我。“因为这是夏天啊，”我以及时行

乐主义者的口吻回答，“不是每天都是夏天。”

被叮咬的火烧火燎，恰似网络给人的感受。在微博上，我躲在角落，甚至感到蚊子大，我小。我看到的是身份政治，是排斥异己，是猎巫，是流行化的全景监察与精神洗澡。在一种热衷于整人的气氛中，流量号的蚊子们，一旦发现人味儿，便吹响喇叭，小透明们——子子们——闻声而动，结成规模惊人的团块，前去噬咬。这一切，再迟钝的人，恐怕也感觉似曾相识。这是对孤独危机的回应，我尽量理解。是竞争口径的收窄和堵塞，导致人性尖叫。是红绿灯导致撞车。也是社交媒体，助力于沉渣泛起，让电子人，一些憎恨人性的比特，挥动词语大棒，相互复制。依照社达规则，这一片野蛮怪诞之中，必定孕育着某种我理解不了的伟大事物。

我不禁又惊又喜——在某个方面。在早期互联网时代，我曾很擅长骂人，享受扮演坏男孩的乐趣。“随便吧，”如今，我已改邪归正，不过我的每条微博都可以翻译成同一个短句，“白痴们。”

乌克兰在打仗，世界再次变得男性化了，醉酒的那种。时隔 799 年之后，唐努乌梁海人和布里亚特人再次西征，在我外祖父的蒙古族祖先们曾经伐过的那个区域——速不台在那里以欺诈和虐杀，给俄罗斯注入了蒙古基因。由此，我了解了 M777，精确的榴弹炮。海马斯。针刺。标枪。我对武器兴致寥寥。我回想起大学军训时 56 式半自动步枪击发之后回膛的感觉：没有感觉。也许手枪击发会是性感体验。手枪的冲击力作用于手。手，是一个感官，而肩膀不是。对于男性气概，我向来不太感冒。可是说我没有男性气概，我又不乐意。这种分裂，非我一人独有，或可说，见诸于 20 世纪我喜欢的每一本书中。《永别了，武器》正是其中之一。在很久以前海明威的关于远方炮火的句子由此注入我的意识，改变了我看待生活与历史的方式。

在这个夏天，炮火的闪光，的确映射在我的虹膜上。温压弹的恐怖白光，在乌克兰，在地球曲面之下，火山爆发般升起，又像珠链般落下。历史摘下领带，穿上军靴，走出证券交易所，回到了炮兵阵地。还有别的闪光。穿着闪亮白色防护服的人群像酸奶部队四处流溢。看不见的东西在焚烧的闪光。钱。人性。电焊的光。将来，这将被记忆为一个焊铁门的夏天。金属被烧灼的滋刺声，一如皮肤在起泡。在历史深处我则看到烧庄稼，烧宫房。在美国南方，又有人从福克纳小说里走出来，烧马棚。我看了《燃烧》，一部韩国电影。我再一次看了《出租车司机》，朱迪·福斯特租用的那个房间里烛影憧憧，像个庙。如果说有什么是这部 1976 年的电影中有而现在的电影中没有了，那就是胆色。入夏时我还写了一个关于火的短篇故事。有一晚，我去了延庆看星星。我蹲下来，给我的小孩指出我记得的那几个星座仰头观望时她无限信赖地抱着我的胳膊。那些遥远而微渺的星火，幽深沉静，一如四十年前。其中仍有无法破译的真理。跟四十年前一样，我仍想知道，在那深不可测的星空当中，有没有谁能看见我。

\*\*\*

在夏日里最美的一天，小鸡们来到了我家，宛如四位公主，

窸窸窣窣，窃窃私语。我用蒸熟的小米喂它们，赞美它们是最棒的——令小区里同时团购来的同类们相形见绌——而它们干的全部事情就是拉屎。当它们长出硬羽，看上去真不协调，身体娇小柔软，翅膀却巨大挺括——扛着翅膀踱步的样子，就像罗锅背着肩膀——似乎仍抱有狂野的飞行梦。我吹捧它们貌似天使。

然后流浪猫吃掉了它们中的每一只。流浪猫吃掉了小区里所有的小鸡。它们还捞鱼。自然，也捕鸟。

一小滴悲伤，在我心里绷紧，又被一阵滑稽的笑震颤出波纹。为什么我越来越多地在悲剧的边缘隐隐发笑？因为只要重复得足够多，任何东西都会产生喜剧效果。小鸡常在猫的利齿下，一如历史常在英雄的利剑下。**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地被谅解了，一切也就可可笑地被允许了。**

在夜里，我则有种相当奇怪的感觉。类似于有点儿渴。我花了一些时间，才辨认出它是青春期的紧张。

如今，某些时候我的意识流连在 1980 年代沈阳的环路无轨电车上。有些时候，我对于 1980 年代中期九路菜市场的水泥储货仓里卷了边的圆白菜和闪亮的紫茄子，怀着相当荒谬的感情。我几乎难以自控地要写关于 1980 年代沈阳生活的小说，问题是，那时是什么样子，我不记得了。何况那根本不是好主意。现在，只有最不精明的人才会写现实主义小说，从每个角度说都是如此。而那种感觉，也不是怀旧。它是一种恍然若真的置身于过去之感。它到底从何而来？

于是我意识到，我这一代人的生活是对称的。青春时期紧张不安，成年后信心十足，如今再次紧张不安。正是这第二阵紧张感，在潜意识里，在某些出神的时刻，把我带回了早年所在的世界。

夏夜里，多年前的沈阳又浮现在枕边。你可以想象无数个泰特美术馆。无穷无尽的蒸汽朋克。真的蒸汽，四处喷涌。我见识过那个世界。我在北京，不过 20 年而已。在那之前，我另有认同与情感。20 年前，因为一桩集体辞职事件造成的空缺，我才有机会得到南方周末的工作。当时的辞职者中，就有前文提及的去世的前记者。在他们辞职的理由中，有一句是，“我们是雅典的公民，但现在是斯巴达的臣民。”我从来没有接近过这种表达方式，却颇能理解。无论你批评它自负又不切实际，或者赞赏其吐属不凡，它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声音。在“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今天回想这些，我感到的是一份天真、一份苍老和一份岁月蹉跎的永恒。

无力匹配其翅膀的禽类。在釜忘沸的游鱼。猝死的前记者。在小区街道上扮演超级英雄的小孩们。生活是被逐出天堂的过程。当然，生活更关乎被逐出天堂之后如何孤独地走完接下来的路。

夏日的时光列车巡回在当下史中，经过一站站的“静默管理”之地。而我回想和审辩的，是经济奇迹曾让我们这一代男性中的多数人都有用处。如今我已能明白，被需要就等于受宠。我们因此所获颇丰——对比更早和更晚的男人。更不用说对比女性。回顾往昔，男性是一个阶级，是伴随着一定剂量的罪恶感的事实——不足以令人胃疼，但令人不安。曾经各式人等都分得一杯羹。我曾习惯于每做一次变动，

换工作，搬家，交往新的女士，都感觉像穿过一道有光的魔法门，到访更奇妙的世界。我们享有和平、开放、繁荣、娱乐、开化的风气、便利的旅行、高性价比的服务业，以及我们以为志业的：一点自由，一滴进步。在那重重混乱中有着分明的秩序——浩浩汤汤的潮流。然而，**死亡并不要求我们有一天的空闲时间。**塞缪尔·贝克特。凡事皆有一死。我不是最该感到遗憾的。我可能已是史上离开天堂走廊的最老的男人了。

偶尔，我会以一种过时的认真，探询人们了解真实的世界的能力，是否已经一去不返。答案是不。不比是更糟。真实被看见了，又被否认了。有一群社会演员，永远拍年轻人马屁以把汤勺伸向最深的碗，我读到了其中之一的说辞：如今的年轻人读书少，思辨弱，但是有一种能力在发展，就是虚拟能力更强。虚拟能力更强？如果我从中读到了讥诮的味道，恐怕不是他的本意。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什么？埃隆·马斯克在生孩子。普通人类在枯萎，而当代成吉思汗大生特生。

知了白天叫，蟋蟀晚上叫。**七月在野，八月在宇。**每个傍晚都在一种永恒不朽的周而复始中慢慢转暗。树莓季节到了，果实累累，堪称灾难。有一天，我读到吴宓日记里的一句，“欲望尽绝，淡泊无营”。我自忖，是否自己也重蹈覆辙，准备拒绝现实世界？不。其一我不配，其二我不能。保持活泛，保持欲望，保持有用，非此不可。当我的小孩飞奔过来，跳进我的怀里，一个巨大的事实是：我是一个父亲。这曾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今，我的热血可以为之流淌在石头上。

终于，幼儿园要开园了。我喜欢那家幼儿园，老师们对待孩子们彬彬有礼，要求孩子们做游戏也要认真。你会感激这样的机构再次运转——事到如今。未来世界会如何？会飘着冷却的灰烬，还是被玻璃壳之类的玩意覆盖？或者，更简单，把孩子们变傻？如今你如何还能预知未来？

开园前两天的傍晚，在小区内部街道上，发生了一桩小小的冲突事件。我小孩和她的两个小闺蜜，气势汹汹，冲着对面的三个孩子又喊又叫。对面的是乔乔和一对姐弟。“嘿！”我提醒她说，“放轻松，乔乔是你的朋友。”可她摆出义不容情的架势，叉着腰，仰起下巴——是我曾告诉她，被人挑衅时要抬起下巴。可现在，看上去是她在挑衅别人？我不喜欢这个场景。在这个夏天，孩子们飞速长大，已经懂得了拉帮结派。我几乎能看到她像只小动物一样肌肉紧绷。

这时一位邻居解释，孩子们只是在玩游戏。我松弛下来。可那种淡淡的危险的味道，余味犹存。

还记得霍尔顿·考菲尔德的计划吗？**我老是想象一大群小孩儿在一大块麦田里玩一种游戏……我会站在一道破悬崖边上。我要做的，就是抓住每个跑向悬崖的孩子……他们跑起来不看方向，我得从哪儿过来抓住他们。**J.D. 塞林格，1951。你可曾想过真实生活中的霍尔顿是什么样子？你以为的霍尔顿，反戴鸭舌帽，真实的霍尔顿，两鬓飞霜。假设在夏日傍晚，在孩子们无尽嬉戏的街道，在错愕与醒悟的时刻，有人已经不太记得这段话，只是感觉到了它——它化作一团模糊却强烈的意识，陡然翻涌，那么换做一个神经质的人，也许会突然热泪盈眶。



# 我们将死于梦醒

陈冲

黎明时分我走出隔离酒店，月亮还高挂着，天空慢慢泛出蓝色的光，希望在夜和昼之间仿佛重新诞生。一股莫名的感激涌上心头，父亲还健在，我很快可以见到他。

一进门，我留心到餐桌上堆满了打开的相册，走近看，大多是父母在各地海滨、河边、湖畔或者游泳池拍的。他们曾每天早一起游泳，几十年如一日。二〇二〇年年底我离开上海前陪他们去了泳池，那天母亲下水没一会儿就累了，说想先上去。父亲哄着她多游一个来回，我还表扬了她，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她已经病魔缠身。一个月后，母亲被两个救生员从池里拽上了岸，那是她最后一次游泳……

保姆说，你爸最近一直在看相片。

我望向父母的卧室，门关着。母亲离开九个月了，我仍然恍惚，好像她随时会从里面走出来。

母亲被确诊为淋巴瘤之前，父亲已经知道凶多吉少了。那时快过年了，我以为他是想过了年再带她去检查。我朋友雪莱去看他们后，给我发信说，你爸爸不舍得送你妈妈去医院，他说他看得多了，这样送进去就出不来了。

父亲还是在年前把母亲送进了医院，我赶回上海时，他自己也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同层的另一间病房。哥哥比我早五天到沪，他隔离完到院才知道那里有了新的规定，从国外回来的人要二十八天后才能进病房探访亲人。他提议让母亲坐上轮椅推到院子里见一面，但是母亲那天坐不起来。第二天哥哥求了一个熟人，带他坐货梯上楼溜进了病房。视频里母亲在呻吟、叫喊，她是个有忍耐精神的人，现在的疼痛一定是超过了她的极限。父亲只能沉默、无奈地坐在一旁，爱莫能助，束手无策。

我们有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她是我表妹的大学同学，曾在平江路的家里住过一阵，我们都叫她小于。小于出国前是医院麻醉科的医生，她建议母亲用一个叫 Propofol（异丙酚）的麻醉药，让她减轻痛苦，得以睡眠，第二天可以有力气进食和承担进一步的治疗。但是母亲的医生说，医院从来没有这样用过麻醉药，无法承担这个风险（当年迈克尔·杰克逊就是打了过量的 Propofol 后死掉的）。

我给父亲打电话，能听到母亲在一旁发出痛苦的声音，我怕他耳背听不清，大声问你能不能请医生给妈妈打麻醉药？他也大声回，不行的，你们是要她安乐死吗？说着就把电话挂了。我叫哥哥去医院，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父亲。他说，我现在进不去啊。我说，要是我，就宁愿压一个枕头在妈妈头上，我宁愿她死。说着我就忍不住哭了，这些天憋在肚子里的眼泪全涌了出来。哥哥听我一哭，也哭了起来。我们两个

人就那么无助无望地在电话两头哭。

第二天我又给父亲打电话，他说，你跟妈妈说话吧。我叫了声妈妈她就哭了，轻轻喊妹妹啊，妹妹啊，说不出别的来。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妈妈你受苦了，我马上就来看你了。过一会儿，父亲接过电话，用沙哑的声音说，妈妈累了，明天再说吧。我突然心痛、内疚，他每天陪在母亲身边，看到她受折磨也一定是心力交瘁，我们凭什么在远处责怪他。

我第一次跟哥哥去医院看望母亲，父亲的助理让我们在电梯对面一间空的缓冲病房，等待父母从他们各自的病房过来跟我们聚会。

母亲被护工在轮椅上推过来，她低垂着头，紧闭着眼睛，瘦得形同骷髅。我胸口抽紧——有些事我们永远无法有足够的准备。她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抓住轮椅的手把，好像在悬崖峭壁，松开了就会一落千丈。我蹲下轻轻唤妈妈妈妈，她睁开眼看见我，就委屈地叫，妹妹啊，妹妹啊。我抱住她的头，她努力睁眼，好像有千言万语却没有力气说。我问她，妈妈要喝口水吗？她说要。我请护工端来温水和吸管，但是她吸了两口就吸不动了。我和哥哥一边一个，抚摸她紧抓着轮椅的手，她慢慢地放松了一些。

在从医院回家的车上，我怅然地望着窗外，梧桐树嫩绿的新叶在阳光里像宝石那样闪烁，一株红色的冬梅、一棵白色的白玉兰偶尔划过。路人们提着袋子进出商店，握着手机、香烟坐在树荫下，外卖小哥们在人群缝隙中穿梭……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我脑子里出现了一首歌：为什么太阳依然照耀，为什么海浪拍打岩岸，难道它们不知道这是世界的末日？

父亲踩着拖鞋的脚步声让我回头，他的脚步踉跄，眼神疲乏，比半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更老了。我叫爸爸，他应了一声就没有其他话说了。我指着一张相片问，你们在哪里拍的？他认真看着我的嘴形，然后说，这是丹麦海边的美人鱼铜像。这之前我并不知道父母一起去过丹麦。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一直都在牵挂你，你还好吗？一个人过习惯些了吗？我经常梦见妈妈，你梦见过她吗？你怎么挨过孤独的日子？但这不是我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对话。父女一辈子，我们从未用语言交流过感情。除了母亲，父亲不对任何人打开心扉。我只见过他一瞬间易受伤害的样子，那是在母亲化疗了一个月以后。

那天母亲躺在硬邦邦的 CT 桌上向我和哥哥大声叫喊，我吃不消了，我真的吃不消了，你们快来救救我！医生随手拿

了一件保护背心让我穿上,却没有找到第二件可以给哥哥。我们就这样犯规进了 CT 间,一面一个拉住母亲的手,在她耳边轻轻重复,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父亲跟医生在隔壁的房间研究母亲的 CT 结果。父亲看过无数例类似的病人,这回轮到他的爱人。从 CT 上看,母亲的肿瘤没有太大的改观。

回病房后,我把 CT 结果告诉了二姨和小姨。小姨发信说:“根据你妈的情况,舒服地走比活着受煎熬好。你爸硬拉着她,太自私了,劝劝他吧。”她建议我直接问母亲是否想走,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敢问。母亲睡着后我回信给小姨,“她没有跟我说不想活。如果妈妈给我明确指示她想走的话,我会义不容辞地去完成。她虽然呻吟叫喊,但是没有说她想走。”小姨说:“据说人到了那一步都有求生欲,那就要说服她进食。”二姨也发信给我,“我姐这么痛苦太可怜了。”我回,“父亲就是无法让她走,要不惜代价让她活下来。他说,叫你们回来就是来跟她道个别。意思是别的不要管。”二姨说,“他说道个别也就是你母亲没救了,那让她安静一些把她想干的事干完,不要再活受罪,你爸也回家,合家团圆地走到终点是对她唯一的爱护。强拉着她受非凡的苦,那是残害她,不人道啊。”

有些话太难启齿,我怕自己说不清楚,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过这段时间对妈妈的观察,她只要是醒着的时候都是非常难受的。有时稍微好些,有时很难挨。今天我和哥哥在她身边一个半小时,她坐了一会儿想躺下,躺了一会儿说还是坐起来吧,坐起来后还是不解决问题,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为了抵抗身体上承受的折磨,妈妈躺着的时候双手总是紧攥着床边的栏杆。我跟她说如果是痛,医生可以给镇痛的药。她说没有用的,我不是痛,是难过。妈妈的感觉和表达都是清晰的。护工和保姆当着她的面议论,说她整天吵,横不得竖不得,说她大便在身上……好像她是个无理取闹的小孩,是个白痴。妈妈自尊心很重,很骄傲,忍无可忍了才这样的。在她这个岁数,在目前皮包骨头、生命力日益下降的情况下,这样的煎熬是否值得?为她换来的是什么?更长久的煎熬吗?”

我郑重其事地把信交给父亲,他读完后什么也没有说,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还给我。我不罢休,鼓起勇气跟他说,妈妈太苦了,不要治疗了。父亲不看我,也不做声。我说,我们接她回家吧,能不能找到足够的吗啡?我们陪着她,给她打针让她走。父亲还是不看我,停顿了片刻后他说,哪里去找那么大的剂量?今天我去陪她,让她多吃点,她说想跟我一道回家……说到这里父亲哽咽了,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涌动,但是他没有让它流下来。他说,你们回家吧。那一刻,父亲犀牛般的盔甲破裂了,暴露了他跳动的心脏。

我每天上午去病房陪着母亲煎熬,夜里神志恍惚地幻想如何去解救她。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哥哥说,我还有二十八片安眠药,今天带去医院,看看有什么机会喂给妈妈。哥哥说,那怎么可以?你又不知道吃了安眠药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说不定她更难受,再说被人发现了你要坐牢的。

母亲的病床靠窗,朝南,病友的床靠门,拉上了白帘子。温暖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把我的影子投在墙上。我凑到母亲耳边问,妈妈,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吗?妈妈,你有任何愿望我都会拼命为你实现的。她说,你跟我一起祷告,要记得祷告。

记得大概在七八年前,母亲坐在卧房的小书桌前发呆,一本打开的书上画满了线,她的健忘症已经发展到无法享受阅读了。我走过去摸摸她的肩膀,她转头说,活着很没劲,没什么可开心的事。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出来。她接着轻描淡写地说,我不会自杀,因为我不能这样对待你爸爸。

还有一次,我在屋里找不到她,觉得奇怪,因为母亲除了跟父亲去游泳一般不会出门的。一股风吹到我的脸上,窗帘飘起来,我这才发现阳台的门敞开着,她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稀疏的头发被风吹得很乱。我走过去叫她,她的眼神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几十年前刚搬进这个公寓的时候,她说喜欢这个阳台,但是让我们千万不要用力靠在栏杆上,万一是豆腐渣工程,掉下去就没命了。我直觉到母亲在思量生死,轻轻把她拉回屋里,说,我想听你弹钢琴。

母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要提前结束这场磨难,那是求生的本能吗?还是爱?

父亲打开钱包,问,你需要人民币吗?我看到里面多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他按照钱包的尺寸印出来的。这是他自己在家里打印的吗?还是去外面专业的地方印出来的?我也有一张同样的,那张是父亲自己放大后染了色的。照片里母亲大概二十出头,我从没见过另一个女人有如此天然和宁静的美丽,有如此深邃和神秘的眼神。母亲走后我配了镜框,放在了换衣间的橱柜上,每天可以看到。有时在完全莫名的情形下——或许半夜三更惊醒过来,或许大白天在微波炉前热午饭,或许傍晚在淋浴时哼歌——我眼前会出现母亲骨瘦如柴的身体,被静脉针扎得一片片青紫。我想,父亲选了这张照片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忘掉——他想用母亲最美好的样子去冲淡她被病魔摧残的记忆。

化疗期间母亲经常拔掉点滴管,胳膊手背上的静脉血管全都无法再用了,必须把点滴装置埋在皮下,从颈动脉输液。这个小手术平时只需局部麻醉,但是因为母亲在清醒的情况下不会配合手术,所以必须用全麻。父亲担心全麻的风险,跟医生说,我可以在手术室里按住她。但医生说,你一个人不可能按住她的头和双肩,她挣扎时带来的风险会高过全麻。

我不信教,对自己和宗教都抱有同样怀疑的态度。但是母亲病重的那个月,我每晚在黑暗中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回想起来,那些时刻我并不“虔诚”,有时会在心里大喊:你到底是她怎么样?你为什么这样折磨她?你为什么阻止我爸爸?

一天,哥哥和我跟往日一样到医院探望父母。母亲突然精

神了许多，她吃了半个我们带去的苹果，还跟着哥哥手机里的音乐唱了《田纳西华尔兹》。父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坚持治疗的信念和承受力终于点亮了希望的火苗——也许母亲的病能得到治愈。从那天开始，她奇迹般地好转起来。我生日那天，正在重庆拍摄《忠犬八公》，父亲打电话给我，好像完全不记得生日的事。他说，妈妈想跟你讲讲话，我要去楼下办公室给病人会诊。

母亲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我在重庆拍戏，你记得重庆吗？你记得在歌乐山的事吗？她说，在歌乐山的时候最开心了。她无法更具体地表述，我便提醒她，记得姚牧师吗？她说，姚牧师最好了，教我唱好多歌。我又问，圣光中学里面有教堂吗？她愣了一会儿后说，我们只要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是教堂了。母亲失忆以后，经常用各种巧妙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头脑的空白。我不知道她的回答是在搪塞我，还是她在头脑里看到了那片雾蒙蒙的竹林，听到了回荡在山谷的祈祷和歌声？我不禁感动，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回答。

我跟母亲说了再见，还没来得及关机就听到她在那头自言自语。原来她不懂怎么关父亲的手机，不知道还跟我连着线。母亲发出各种困惑的呻吟，好像不知道她接下来将面对什么，该干什么。然后，她开始急促地祷告。待她停下片刻，我轻轻叫了声妈妈。她慌忙地问，妹妹？你在哪里？我说，在重庆拍戏，在跟你通电话，我们一起祷告吧。我按照她曾经教我的祷文说：亲爱的主，感谢你所给予我们的一切，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过，指引我们的言行，听我们的祈祷。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健康、力量、智慧和勇气，与我们同在，求你保佑妈妈……母亲马上添了一句：亲爱的主，我把妹妹交给你，求你保佑她家庭美满事业成功，求你指引她，做你的好孩子，不做你不喜欢的事。那天我六十岁，却还是个孩子——母亲的，上帝的。那是我所有生日中最难忘的礼物。

从重庆回来后，我每天上午陪母亲在病房里唱歌，父亲也在一旁听着，有时眼光变得遥远。记忆里那些母亲摆脱了苦难的日子，屋里总是充满了阳光。窗户很大，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她专注的歌声充满了少女的渴望：小鸟在歌唱，野花在开放，阳光下面湖水已入梦乡，虽然春天能使忧愁的心欢畅，破碎的心灵再也见不到春光。我走山路，你走平原，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但我和我爱人永不能再相见，在那最美丽的罗梦湖岸上……她走后我才知道那是一首苏格兰民谣，叫《罗梦湖》。

有一天，母亲在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到“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时候，她突然说，这句倒是蛮性感的。我惊讶不已，如果没有音乐伴随着这词，她绝对没有能力产生这样的联想。我再一次被音乐的神秘所迷惑，我猜它始于人脑最原始的中枢是先于语言的东西？音乐通过母亲脑中已经病变的边缘通路穿刺到她已经萎缩了的海马体、杏仁核，刹那间的感官记忆，像一次短路的火花，照亮她黯淡的意识，那个时刻她感受到了喜悦。

母亲总是早上四点就起来去父亲病房找他，搞得他不够睡，很疲劳。我跟她说，你早上千万不要那么早就去找爸爸，他

休息不好身体会垮的。她很惭愧地答应，明天让他睡饱，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记了，又一大早去找他。有时候，母亲还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跟父亲发脾气。他自己也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但这种时候只好把她当小孩哄，从不怪她。我想起《本杰明·巴顿》里布拉德·皮特演的角色，在生命的尾声变成一个婴儿，躺在恋人怀里。

母亲去世那天早上，父亲看到她痉挛的样子，脸色灰白，差点摔倒在地，哥哥请驾驶员送他回家躺到床上。那一晚父亲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去了办公室。那之后的两周他都失眠，但是每天坚持上班。最爱的人不在了，七十年共同的记忆、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也都随之消失。但最爱的的工作还在，它像地心引力那样将父亲安全地拴在一个熟悉的地方。

早上七点三刻，父亲跟我说，我上班去了。他的语气严肃平静，眼睛里流露出活力。

他从上海医学院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了一个犯罪研究所，由苏联专家培训破案。那是安全局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性质的政治性很强。

报到的时候，父亲看到另外几位都是政法学院毕业的人，就跟负责人说，我只会当医生，不合适做破案工作。负责人说，我们破案有爆炸、燃烧、痕迹方面的工作，需要懂物理化学的人才。父亲说，我是医学系的，没有学过什么物理化学，药理学的人这方面也许更强一些。但是那个负责人还是没有被说服，父亲只好硬了头皮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在档案里有没有看见，我当过反革命。负责人一个电话打到上医，结果档案的确如此，他就让上医马上换一个人来。

当时有两个没人愿意去的科，一个是组织胚胎科，另一个是放射科，而最没人想去的就是放射科，当年只有一台拍胸片的机器，什么其他设备都没有。父亲被退回学校后就自告奋勇去了放射科，那是一九五六年，他二十五岁，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他直接骑车去南京路为母亲和自己各买了一条裤子。不知为什么，他们多次说起这件事，仿佛那是生命中十分特殊的一天。六十六年过去了，华山医院放射科早已鸟枪换了大炮，九十一岁的父亲仍然在那里为人看病。

记得一次母亲需要去华山分院的 PET 中心外做全身扫描，天不亮我和驾驶员就赶到病房去接父母。父亲还在洗漱，他说，不用那么早就去。我说，昨天医生关照了一定要在六点钟前到，不然就要排队长等很长时间，妈妈会太累。他说，不会的。到了 PET 中心，父亲熟门熟路，跟那里的医生们聊起中心的各种人和事，我这才想到他是中国放射学的元老之一，是国内应用 CT、MRI、DR 和 DSA 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开拓者。父亲桃李满天下，到 PET 中心就像回到老家。

母亲开始第三轮化疗以后，我跟父亲说了我即将回美国的计划。他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但还是瘫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说，不能多陪你妈妈几天了？我说，我四个多月没回家了，趁妈妈现在还稳定我先回去一下。他说，现在



从美国再回上海的话，要隔离三个礼拜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也听说了。父亲说，万一她发生什么意外，你赶都赶不到。说完，他打开手机电脑阅读起影像学的文献，哪怕住院他都从未耽误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思考我看着他背影，感到他的孤独和疲劳。

患心脏病的父亲，照顾着患失忆和癌症的母亲。如此艰难的时候，孩子都不能在他身边。当年把我们送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他有没有后悔？几年前有一次，好像是父亲需要处理什么复杂的事务，令他烦恼和疲惫。他跟驾驶员说，小孩都是白养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上海封控期间，父亲的日子非常难熬，他不会用微信，更不懂怎么在网上抢菜。我很久都买不到回沪的机票，最后买到了又被熔断了两次。父亲耳背，我怕电话讲不清楚，就写了微信请表弟转告。父亲看完后说，大概都是借口。

我奶奶父母的坟在老家江西南昌郊外记得父亲跟我说过，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当地政府要在坟地上面建公路。父亲接到通知后去那里迁祖坟。按当地习俗，挖坟时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同去。挖开后，父亲看到坟边小溪的水不知在哪年哪月改了道，他祖父母的棺材已经浸泡在地下水里。棺材被抬起后有六条鱼在水里慢吞吞地游。再仔细看，父亲发现因为它们一辈子没有见过日光，所以眼睛是瞎的。算命先生看到这个景象，考虑了一下说，要把家里的六个小辈送到国外去。父亲有些震惊，奶奶这条线下来到我这辈，一共有八个后裔，其中有六个在国外生活。也许父亲埋怨的是命运，而不是我们的不幸。

航班是晚上起飞，白天我最后一次去医院陪父母。我们跟往常一样在病房里唱歌，然后一起吃午饭。母亲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父亲从他的小冰箱里拿出一块栗子蛋糕，说，阿中啊，甜品。母亲便笑咪咪地接过来吃。我好奇，在六十年的婚姻里，他们有过别的渴望吗——那些互相无法满足的渴望？那似乎是人之常情。他们也一定有过对方无法分享的欣喜、无法分担的痛苦，或者在孤独难挨时的诱惑？我大概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

从病房回到家里，猫咪围着我叫，我蹲下来摸它。它刚来父母家时，送猫的朋友常来问问它的情况，母亲会说，这只猫聪明得不得了，都可以当我的研究生了。或者，这只猫懂事得不得了，以后我们不行了就全靠它了。这些年来，父母看电视的时候，它总爱在父亲的膝上躺着；母亲弹钢琴的时候，它总爱在琴凳的一端坐着；我每次开门，它都迎上来叫我，用脸蹭我的裤腿。猫咪被蹭得舒服了，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我，懒洋洋的身体呼噜呼噜作响。家里还剩一罐鱼肉罐头，我打开给它，它吃得很香，完后仔细地舔自己的毛，完全不知道我将不得不把它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所有的爱从一开始就在走向终局的失去，连猫也无法避免这必然的命运。

父亲现在很少在餐桌吃饭，早饭一般在书房的电脑前边写书边吃，午饭和晚饭就在电视机前边看剧边吃。一天，他难得跟我一起在餐桌吃饭，想到了猫咪，跟我说，猫咪现在可以回来了。我说，先不急，你一个人在上海，我和哥哥都很

不放心，疫情期间来回飞实在太困难了，你还是来美国跟我们住一段吧。他说，我最近在研究脑部毛细血管病的预防和治疗，太忙了走不开。疫情一结束我还要去老挝，国家领导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父亲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流浪癖，十分向往远方和未知。七十年代，他带了一个医疗队去多哥工作，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天。那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被世界的丰富和宽广所震撼。也许，流浪的种子就是那时埋入了他的心田。

医疗队宿舍里的用水质量很差，父亲就每天跟同事一起，带着大桶去爬山，再把山里的泉水一桶桶地运回宿舍，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喝过最甘甜的水。当地一个酋长的大老婆常找父亲看病，酋长也就成了父亲的朋友。大老婆住在泥巴和干草糊的房子里，窗帘和床单都是各国访问者送给酋长的国旗。

多哥非常贫穷，但是在那里父亲远离了国内的政治运动，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几个月后，他就向驻多哥中国大使馆申请把我们全家都调去多哥，理由是作为医生他可以比官方更有效地了解当地民情，促进中多友谊。我们一家差点成了多哥人，幸好大使馆没有批准他的要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每年十一月都到美国参加放射学的年会，他还常去欧洲各国考察交流，为华山医院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澳门回归后，他带领华山的医疗队，为澳门卫生司所属的多家医院发展和培养医疗骨干。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他就越来越走不开了。偶尔，他会带着母亲去离上海不太远的城市参观和讲课。有几次，趁我或者哥哥在上海的时候，他把母亲交给我们照顾，然后飞去外地出差。现在，父亲念念不忘的是老挝。

大约在六七年前，父亲告诉我，中央批示成立了中国精准医疗战略专家组，我的影像中心就是研究“精准医学和精准影像学”的。有个老挝人来华山医院参观访问，邀请我去为他们建立一个精准医疗的医院，这个老挝人以前是国家领导在高中的同学，现在领导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去做。老挝天气热，我要去裁缝店做两套麻布西装。说着，他拿出一张他们在华山医院的合影给我看，老挝人身穿米白竖领上衣，斜披着一条五彩缤纷的肩带，父亲身穿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容光焕发。

后来疫情席卷全球，再后来母亲病倒，老挝之旅就此搁浅。母亲走后，父亲越来越沉默不语，唯独在提到老挝的时候，他会提起精神来说话。中老铁路开通后，他多次在地图上仔细安排从上海去万象的路线，说，现在我可以坐火车去了，顺便一路玩玩。

我说，老挝疫情一直没有间断过，现在已经与病毒共存，你这个年纪去太危险了。他说，那个老挝人去年中风瘫痪，最近死掉了。我说，那就不要再想去老挝的事了。他说，他死之前把建医院的事交给了一个朋友，我们联系过了。我答应了他们建医院，以后还是要去的。

这事听上去越来越玄了，我和哥哥都不能确信它是否存在，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件真事。父亲的确是极其优秀的医



院创业和管理专家，在他当院长的十一年中，华山医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以全市最高分被评为三级甲等医院；老挝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派父亲去那里投资建医院也没有不自然的地方。父亲坚持说，老挝的医院一定会建的。

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奥兰多》中的一段话，大意是：幻想对于灵魂就像大气层对于地球。如果没有了那层温柔的空气，万物将失去生灵与色彩，大地将变成一片灰烬，滚烫的鹅卵石将灼焦我们的脚底。实话说，到那时我们就完蛋了。生命是一场梦，我们将死于梦醒。谁剥夺了我们的梦，就剥夺了我们的生命。

也许老挝之梦对于父亲就像大气层对于生命。谁知道呢？说不定真的有一天，他会带着我和哥哥坐上中老列车，去那里陡峭的高山、狭窄的河谷、茂密的森林中探险；真的有一天，他将完成国家领导交给他的任务，为老挝建造出一个最现代化的医院。

也许“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包含在我们所有的梦想和那些一厢情愿的神奇念头里，毕竟我们最强烈的渴望和恐惧都源于和坐落其中。梦想比现实中发生的事更真实地谱写了我们的传记。

父亲每天下午把自己关在卧房里四五个小时，有时更长，天黑了也不出来。他在里面想什么，干什么？我无法知道，只能想象他是在与悲伤对话。悲伤说，陈星荣，你不可能像爱张安中那样爱任何人了。父亲说，是这样的。悲伤说，也没有人会像她那样爱你了。父亲说，是不会有。悲伤说，你再也听不到她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了。父亲跪下来，说，我投降，你饶了我吧……

琼狄迪恩在女儿和丈夫相继死去之后写了《奇想之年》一书，她说悲伤像风暴中的浪涛，打得你膝盖发软，眼睛昏黑。也许在一波巨浪平息下来的间隙他去打印了那张母亲的照片，放到钱夹里。走出卧房时，他是个刚从海啸中幸存下来的人。年轻人也许可以从失去中找到意义，在治愈中得到成长，他们的面前还有着很长的路和其他的爱。对于九十一岁的父亲，失去相濡以沫近七十年的老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令人绝望的事。从母亲确诊到十个月后去世，从她去世到今天，父亲到底有过多少幸福的时刻使他如此顽强地生活？当他从折磨中得到喘息的时候吗？好比漫长黑夜后黎明的曙光，好比严冬过后万物复苏的景象。

好比七十年前，在前景最无望的那天，他得到了母亲爱的誓言。

“肃反运动”中，父亲和几个好友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小集团”，揪出来在全校批斗。因为共青团领导知道父母在恋爱，母亲被点名在大会上揭发父亲。众目睽睽下她浑身发抖脸煞白地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他们都是好人。

“……那时我和陈星荣好，但关系尚未明确，想等两年再说。

我见他坐在角落里写着什么，就走过去问他。他轻声说：写交代。我问：交代什么？他放下笔说：他们要我回忆出所有干过的坏事、丑事，并交代当时的思想活动，不论事件大小，再小的也不许遗漏。我想安慰他，但所有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我们才二十出头，正是人生最灿烂、最有朝气的年龄，进了一流大学，将来成为好医生，治病救人，无上光荣。可现在他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成了阶级敌人，将受到怎样的镇压和发配？这一生的日子将怎样度过？那一刻我就做了决定跟他说不要交代了！你放心不管他们把你打成什么，我只嫁给你！他似乎有些吃惊，接着就哭了。我们抑制不住愈来愈响的哭声，忘记了这是在图书馆。但是周围座位上，坐在磨砂玻璃挡板后面看书的人始终保持肃静，默默地给了我们同情和支持。”

我很难想象父亲大声哭泣，那该是什么样的幸福啊。也许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它的前提是足够的痛苦。父亲钱夹里的照片，就是那时的母亲。

整理母亲的橱柜时，我发现一个文件夹，上面写着“妹妹资料”，里面是我一九八一年申请出国的文件和信件。其中有一封父亲为我写给有关领导的信，密密麻麻三页纸，写在华山医院的信笺上，一共修改、抄写了四遍。我完全忘记了这回事。我的申请遇到了阻碍，得不到批准。当时父亲在纽约做访问学者，为了我的人生能有更开阔的地平线，他特地提前回国来帮我奔走。信写于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我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飞往纽约。那天父亲说，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觉不去送你了。我说，哦，那我吵醒你。留学四年后回家，父亲照例没有去接我，但是我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将我一把抱起来。我双脚离地悬在他的怀抱里，片刻，感到惊喜、幸福和莫名的尴尬。那是我成年以后他唯一一次抱我。父亲从没说过，不过我知道他一定是非常想念我的。

又到了离开的日子，我和父亲一起无言地吃早饭，他吃两个鸡蛋白喝一杯西瓜汁然后吞下每天早上该吃的药和维生素。我吃两个苹果喝一瓶酸奶，再把他给我的维生素吞下去。早饭后他就回到电脑前看脑部核磁共振的图像，母亲的健忘症给他带来很大的刺激，使他对脑部毛细血管走火入魔。我一个人呆坐在那里，不知怎样让他知道我很爱他。我与父亲有太多没说的话。

朋友在微信里建议，“你给他留张条子，回忆些过去难忘的细节，放在他会看见的地方。”我回，“好的，我试试。”

我没有给他留条子——又一次屈服于惯性，还是天性？

飞机开始升高，窗外渐远的灯火和渐厚的云层仿佛奇妙的海底世界，父亲大红色的泳帽出现在我的脑海，它在水里时而浮起时而沉没，不管池子里人多人少，不管他游到哪个角落，我都能从眼梢看见那团红色。不知父亲有没有留意我的蓝泳帽，感觉到某种心照不宣的亲情？

# 现代性与大屠杀

齐格蒙·鲍曼

## 官僚体系之对象的非人化

在官僚体系的背景下行为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后果是官僚体系行为对象的非人化，也就是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

我们将非人化和集中营囚犯令人惊悚的画面联系起来——他们所受的侮辱是：将他们的行动降低到简单生存的最基本水平，禁止他们使用人格尊严的文化符号（包括身体上和行为上的），甚至让他们失去可辨识的人相。就像彼得·玛什所说：“站在奥斯维辛的围墙边，看着这些消瘦的骨架、皱缩的皮肤和深陷的双眼——谁能相信他们真的是人？”但是，这些画面只是所有官僚机构——无论这些官僚机构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有多么仁慈和无害——都具有的某种趋势的极端表现。我认为对这种非人化趋势的讨论，与其关注其最耸人听闻和最恶劣的、但所幸是鲜有的表现形式，倒不如关注其更加普遍并因此具有更大的潜在危险的表现形式。

非人化开始于官僚机构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因为拉开了距离而可以并在实际上被简化为一套定量措施之时。对铁路经营者来说，对他们的工作对象惟一有意义的说明是吨 / 公里等计量单位。他们并不处置人、羊或带刺的铁丝；他们只需处理货物，这就意味着一个完全由测量组成并缺乏质的规定性的实体。对大多数的官员来说，甚至如货物一类的东西都意味着一个非常严格的质的规定性界线的限制。他们只处理他们行为的财务结果。他们工作的对象是钱。钱是在投入和产出两端惟一出现的东西；正如古人精明地观察到的，钱财 (pecunia) 显然是不会白白被发现 (non olet)。随着官僚化的公司不断地膨胀，它们很少把自己限制在行动的定性比较特别的领域。由于在运动中受到获利主义 (lucrotropism) ——一种令他们的资本获得高回报的牵引力——的引导，他们斜向扩展了。我们应当还记得，大屠杀的整个实施是由国家安全总局的经济管理厅负责的。此外我们也知道，纳粹的这个命名并不是想作为一个策略或者一个伪装。

跟所有其他的官僚机构管理对象一样，作为对象的人已经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特性。他们早已被非人化——这是就叙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或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语言有效地防止了其指示对象受道德评价的意义而言。实际上，这种语言不适合于标准的道德陈述。因为只有人才是道德命题的对象。（确实，道德陈述有时的确延伸至其他非人类的生物；但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从它们原初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立足点

开始扩展。）人一旦被简化为零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非人化与现代官僚体系最本质、最理性的趋势密不可分。由于所有官僚体系多少影响着某些作为人的对象，因此非人化的负面影响比将这种影响与它的种族灭绝结果几乎完全等同起来的习惯所具有的影响要普遍得多。战士被命令射击目标，当目标被射中时就会倒下去。大公司的雇员被鼓励去破坏竞争。福利机构的官员在这一时间操纵的是可自由支配的奖金，而在那一时间又是个人存款。他们的对象是补助金的收取者。要感知到并记住所有这些技术术语后面的人是很困难的。而问题在于只要还在官僚体系的目标的范围内，他们最好就不要被感知和记住。

一旦官僚体系执行的任务的人类对象被有效地非人化，并因此被废止了作为道德需求的潜在对象，他们就会被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来看待；一旦他们的抵抗或不予合作阻缓了官僚程序的顺畅之流，这种道德冷漠就会很快转变为非难和指责。被非人化的对象连一项“事业”都不可能拥有，更不要说一项“正义”的事业了；他们没有“利益”值得考虑，准确地说就是没有要求主体性的权利。他们因而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因素”。他们的难以管束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公务员的自尊和友谊的纽带。现在，后者把他们自己看做是一场艰苦斗争中的伙伴，需要勇气、自我牺牲和对事业的无私奉献。不是官僚体制行为的对象，而是行为的主体在遭受痛苦，值得同情并应受到道德的赞扬。他们从镇压受害者的反抗中获得自己尊严的荣誉和信念，就像他们为越过其他任何障碍一样感到自豪。对象的非人化与积极的道德自我评价两者互相强化。公务员可以在忠实地履行职责的同时保持他们自己的道德良知不受到任何的损害。

总的结论是，由于官僚体系行为模式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包含了在执行种族灭绝任务中被证明是必需的所有技术因素。这种模式不需要对其结构、机制和行为规范作任何重大的修正，就可以应用于种族灭绝的目标。此外，与一般观点相反的是，官僚体系不仅仅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在一些时候被残酷的、道德卑鄙的目标便捷地利用，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也服务于非常人道的目标。即使它在推力作用下可以朝任何方向移动，但它还是更像一个实心的骰子。它有属于自己的逻辑和动力。它使得一些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大一些，另一些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小一些。如果被施以一个第一推动力（也就是面临着一个目标），只要施加第一推动力的人还控制着他们所引发的进程，官僚体系——就像魔法师徒弟的扫帚一样——仍然可以在推动力已经停止了任何一个地方轻易地运行下去。官僚体系

按部就班地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它按部就班地衡量最佳值，不会区分一个目标同另一个目标之间的差别，也不会区分人和非人目标之间的差别。重要的是效率和降低它们执行过程的成本。

**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中的角色**

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官僚体系被赋予了营造一个无犹太人的德国的使命——清除犹太人。官僚体系从它应开始的地方起步：将对象进行精确定义，将那些符合定义的人进行登记并为他们每个人建立档案。接着官僚体系将档案上的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接到的指令不实施于后者。最后，它开始将被隔离的群体驱逐出需要清洗的雅利安领土——先是敦促他们迁出，而当他们占领了德国以外的地区后就把犹太人驱逐到这些地区。至此，官僚体系形成了出色的清理技能，一点儿也没有被浪费和闲置。将清洗德国的任务完成得如此出色的官僚体系使更具野心的任务变得可行，也使选择这样的任务如水之就下。既然有如此完美的清洗功能，为什么要在雅利安的家乡停下来呢？为什么不清洗整个帝国？确实，由于帝国在当时幅员辽阔，它没有“外在的地方”来作为处理犹太垃圾的倾泻地。惟——一个剩下来的驱逐方向就是：朝上，通过烟的方式。

多年以来，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已经分裂成“意向主义者”阵营和“功能主义者”阵营。前者认为屠杀犹太人最主要还是源于希特勒坚定的决心，只是等待机会将之付诸实践。后者相信希特勒只是有着“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普通想法：这种想法只有在“清洗德国”的观念上才是清楚的，但对如何采取实践步骤实现这个目标仍然感到模糊和困惑。历史学者一度更明确地倾向于支持功能主义的观点。但无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延伸在观念与其实施之间的空间被官僚机构的行动填得满实满载。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无论希特勒的幻想有多么生动，但如果这个想法没有被一个庞大的、理性的官僚化机器接手并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常规程序，那它将一无所成。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官僚体系的行为模式留下了其在大屠杀进程中不可磨灭的痕迹。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的指纹遍及整个大屠杀的历史。诚然，官僚体系的确没有孵化种族污染的恐惧和种族卫生的成见。要孵化恐惧和成见它还需要有空想家，因为官僚体系是在空想家止步之处继续下去的。但官僚体系制造了大屠杀，以它自己的形象制造了它。希爾博格认为，第一个德国官员写下第一条驱逐犹太人的规则之时，也就是欧洲犹太人的命运成为定数之时。在那个时候存在着一个最深奥、最令人恐怖的真相。官僚体系需要的是对其任务的定义。尽管它是理性和有效率的，它仍然需要被相信可以自始至终地把任务执行下去。

官僚体系对维持大屠杀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天生的能力和技能，还在于其固有的不足。所有官僚体系忽略原初的目标、转而关注手段——转变为目标的手段——的趋势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分析和描述。纳粹官僚体系也不例外。一旦启动，屠杀机器就会形成它自己的推动力：它清洗它控

制的犹太人地区的工作越出色，它就越积极地追寻新的领地以实验它新获得的技能。随着德国军事失败的日益迫近，最终解决的初始目标变得越来越不现实。那么，保持屠杀机器继续运转的就完全是它自身的惯性和动力了。集体屠杀的技能之所以不得不用，只是因为它们是现成的。专家们是为他们自己的专业技能创造目标。我们还记得柏林犹太人办公厅的专家们对那些几乎早已从德国国土上消失的犹太人制定了一项项细致入微的限制；我们还记得纳粹党卫军的指挥官不顾在军事行动中急需技工的事实而禁止国防军保存任何一名犹太人工匠。但就是这样，任何一处的用手段代替目标的病态趋势，都比不上在离东部防线仅几英里的地方发生的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犹太人离奇而恐怖的屠杀事件，德军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军事代价：无法估价的轨道手推车、发动机、军队和管理资源从军事任务中调离，去为德国居民清洗他们永远不会涉足的欧洲偏远地区。

官僚体系有执行种族灭绝行动的内在能力。要进行这样一个行动，官僚体系还需与现代性的另一个创造相遇，即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更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大胆设计——比方一个种族单一的社会或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以及最重要的是绘制这些设计的能力和使它们运作起来的决心。两种现时代普遍而丰富的创造相遇就产生了大屠杀。因此，不同寻常和鲜有发生的仅仅是它们的相遇。

**现代防卫的破产**

身体暴力及其威胁“不再是带入个人生活的永久性不安全，而是安全的一种独特形式……是一种持续、始终如一的压力，通过隐藏在日常生活情景表面之下的身体暴力施加在个人生活之上，这是一种完全熟悉但又几乎无法察觉到的压力，行为和动力系统从最初的时期就已经被调整得适合这种社会结构”。

在这些话中，埃利亚斯重述了文明社会熟悉的自我定义。将暴力从日常生活中消除是这个定义所围绕的主要观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消除实际上只能算是一种驱逐，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在社会系统新的位置上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暴力核心的部署。埃利亚斯认为，这两者的发展是紧密地互相依赖的。日常生活的领域受暴力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这恰恰是因为身体暴力潜藏在某处——数量之大使它们有效地脱离了社会普通成员的控制，也赋予了它不可抵御的力量以镇压未经授权而爆发的暴力。日常举止之所以温和，主要是因为假如它们都是暴烈的，那么人们现在就面临着暴力的威胁——一种他们无法匹敌也无望赶走的暴力。可见，暴力从日常生活的视线中消失是现代权力集中和垄断趋势的又一体现；个体交往缺乏暴力是因为它显然受到了个体之外的力量的控制。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外在于每个人可触及的范围。因此，日常生活中过于吹嘘的温文尔雅的态度（这是埃利亚斯跟随在西方病因学神话之后大加颂扬的）以及随之而来让人惬意的安全都有它们的代价。我们这些现代社会大厦里的居民随时都有可能被要



求去支付这个代价。或者，没有事先的要求，就被迫去支付。日常生活的和意融融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无力自卫。随着现代社会成员同意或被迫在他们相互交往中放弃使用身体暴力，他们在面对未知而通常不可见的，又可能是邪恶并且始终令人害怕的强制监管者的时候，自己就缴械投降了。他们的弱点较之另一种高度的可能性而言还不是很令人担心的：基于强制的监管者会不会利用这种强制的优势在原则上不取决于普通男男女女的所作所为这个简单的事实，强制监管实际上就极有可能利用强制并迅速将他们控制的暴力手段转而对付失去抵抗的社会。现代社会成员自身是无法阻止大规模强制力量被利用的。与柔和的态度携手共进的是对暴力的控制的根本转变。

如果没有对在我们看来已深嵌于现代文明社会结构中的防卫措施的信任，现代权力特有的失衡所带来的长期处在威胁之中的意识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信任是一种误入歧途。只有在极少数的戏剧性场合下，我们才会怀疑防卫措施的可靠性。或许大屠杀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少数最可怕场合中的一个。在通向最终解决的那些年里，最受信任的防卫措施都接受了检验。但它们全部都失败了——一个接一个地，彻彻底底地失败了。

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失败——作为一套观念，也作为教化和训练的机构网络。现代科学中最受尊敬的原则和成就的致命潜力已经被揭露无遗。将理智从感情中解放、将理性从规范的压力中解放、将效用从道德规范中解放，在科学的一开始就已成为其战斗口号。但是，这些口号一旦被执行，它们就使得科学及其产生的大量可怕的技术应用变成了不道德力量手中温驯的工具。在使大屠杀得以持续的过程中，科学既直接地又间接地扮演了黑暗而不光彩的角色。

间接地（尽管对一般社会功能而言是最核心的），科学为大屠杀的发生扫清了障碍，这是通过侵蚀权威，质疑各种规范性思想的约束力量，特别是宗教和道德的约束力量来完成的。科学将自己的历史看成是理性反对迷信与非理性的长期不懈而最终胜利的斗争的历史。由于宗教和道德无法合理地将它们对人类行为的要求进行理性的合法化，因而遭受了责难，其权威性也被否定了。由于价值和规范被宣布具有内在而不可替代的主观性，于是工具性就成为剩下的惟一个可以追求卓越的领域。科学要求价值无涉，并以此为荣。通过制度性压力和嘲讽，它让道德的辩护士们哑口无言。在这个过程中，它让自己在道德上紧闭双目、不置一辞。在合作设计大众绝育或者集体屠杀最有效、最迅速的手段的过程中，或者，在构思集中营奴隶制、把它作为进行医学研究以促进学术进步——当然也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极好机会的过程中，科学带着狂热和放任拆除了所有阻止它的障碍。

直接地，科学（在这里，更恰当地说应当是科学家）也帮助了大屠杀的实施者。现代科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科学研究花费惊人，它需要大型建筑物、昂贵的设备和大量

量高薪的专家队伍。因此它依赖于货币和非货币资源的持续流动，而这只有相当大的机构才能够提供和保证。但是，科学不是商业，科学家也不贪婪。科学是关于真理的，科学家也在追求真理。科学家充满了好奇心并因未知而兴奋。如果用所有其他包括金钱在内的世俗观念来衡量，好奇心是无关于功利的。科学家所宣扬和追寻的只是知识和真理的价值。如果没有日增益长的基金、成本日益增加的实验室、数额日见其多的工资单，好奇心就得不到满足，真理就不会发现，这也不过是个巧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刺激。科学家所想要的只是被允许到他们那求知的渴望所梦想的地方。

一个对科学家伸出帮助之手、提供支持的政府才能指望科学家的感激与合作。作为交换，大多数的科学家会准备随时交出一份戒律更少的长单子。举例来说，他们会准备以歪歪鼻子或者列入传记条目来对待同事的突然失踪。如果他们决然反对，情况就可能是一次性地带走他们的全部同事而使研究计划处在危险之中。（这不是诽谤也不是讽刺；这是从记录在案的德国学者、医生和工程师的抗议中归结出的。在大清洗期间，从苏联那些科学工作者那里听到的抗议就更少了。）德国科学家满怀欣喜之情登上了由纳粹机车拉动的列车，驶向勇敢的、新的、种族纯净的德国统治的世界。研究计划一天随着一天地更加雄心勃勃，研究机构也一刻随着一刻地更加壮大，更有实力。其他的则不重要。普洛克托在他新近对生物学和医学在设计 and 实施纳粹种族政策时所做的贡献的精彩研究中，把流行的科学神话首先当做迫害的受害者和从上到下强烈灌输的一个对象而结束了它的神话（一个至少从李约瑟在 1941 年出版的有影响的著作《纳粹对国际科学的攻击》就开始的神话）。根据普洛克托的细致研究，广为流传的观念过分低估其政治积极性（准确地说是它们中最可怕的一些）是科学团体自己所产生，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不情愿而又懦弱的科研工作者的程度，也低估了种族政策本身由那些公认的、学术上受绝对信任的科学家策动和管理的程度。如果那里存在着强制的手段，“它就会经常是一派科学团体压制另一派的形式”。总体而言，“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对于种族计划）许多社会和思想的基础就已经被铺垫好”，并且生物医学“在纳粹种族计划的策动、管理和执行中扮演了积极的甚至领导性的角色”。普洛克托对一百四十七家纳粹德国出版的医学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不辞劳苦的研究，结果表明，受到怀疑的生物医学家无论从什么标准看都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处在对其职业异常狂热之边缘的人。在希特勒上台后，编辑委员会要么保持不变，要么只替换了一小部分人（这种变化完全是因为撤换了犹太人学者）。

对理性的崇拜被制度化成为现代的科学在最佳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无力阻挡国家转变为有组织犯罪；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在此转变的过程中推波助澜。沉默的德国学者有着大量的同伴。最引人注意的是，教会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所有的教会。面对有组织的非人道所表现的沉默是经常不和的教会之间惟一的共同之处。他们中没有人



要求归还他们受到嘲笑的权威。没有一个教会(由于与单个、大多数是孤立的牧师有所不同) 承认对发生在它曾宣布属于其领地的国家之内、由其牧师所主管的人(希特勒从来没有离开过天主教; 他也没有被逐出教会) 所犯下的行为负责。也没有一个教会坚持它的权利, 对其教徒进行道德的审判并把忏悔强加在刚愎自用者身上。

更确切地说, 文化熏陶出的对暴力的反感被证明在对付有组织的强制手段时不堪一击; 同时, 文明的行为举止显示出与集体屠杀令人惊异的和平与协调共处的能力。旷日持久而经常是令人痛苦的文明化进程甚至连一个坚固的防止种族灭绝的屏障都建立不起来。那些机制则需要用行为的文明模式以不与作恶者们的自以为是相冲突的方式来协调犯罪行为。文明对非人道的厌恶在旁观者中被证明还不够强烈, 而无法促成对非人道的积极反抗行为。大多数旁观者按照文明的规范建议和鼓励我们对不雅和野蛮的事物做反应的方式做出了反应,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别处。少数站起来反对残暴的人却无法找到支持和安慰他们的规范或社会认可。他们是孤独者; 那些替他们反对罪恶进行辩护的人只能引用他们杰出的前人曾说过的一句话:“我无法改变。”在面對不道德团体利用其对身体暴力和强制的垄断驾驭现代国家的强大机器时, 作为反对野蛮的护卫措施并备受吹捧的现代文明的成就, 遭受了失败。由此证明, 文明无法保证它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

## 结论

如果我们现在质疑谁是致使大屠杀发生的元凶, 民主的崩溃(或未出现) 似乎是最可信的答案。在缺乏传统权威时, 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提供惟一的、能够使国家远离绝境的控制与平衡。然而, 一旦旧权威的力量和控制系统被破坏——尤其这种破坏在短时间内完成, 政治民主就不会很快地出现, 而付诸实践则更要迟一些。这种空白期和不稳定的情形一般发生在影响深远的、成功地使社会力量之旧构架瘫痪而又还没有代之以新构架的革命期间或者之后——并因此而造就了一种事态, 即政治和军事力量既没有达到平衡, 也没有受到有实力、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的约束。

可以说, 这种情形在前现代时期也出现过——接踵而来的血腥征服或长期的内部斗争, 有时会导致社会公认的精英几乎全部毁灭。然而这种情形可想见的后果却有所不同。在这之后是较大的社会秩序的全面崩溃。战争的破坏极少会向下抵达社会控制的基层的公共网络; 公共管制的社会秩序的地方片区暴露在暴力和掠夺的反复无常的行为面前, 但在地方层次以上的社会组织解体后, 它们还有自己可以依靠。一般而言, 在前现代社会中即使是对传统权威最沉重的打击, 与现代的剧变仍然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差异: 第一, 前现代社会剧变后, 最基础的、对秩序的公共控制仍然完好无损, 或至少尚可运行; 第二, 由于高层控制的社会组织瓦解, 在各地之间存留的一切交换再次遭受不协调力量的自由支配, 因此前现代社会剧变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超地方层次的组织行为的可能性。

与之相反的是, 在现代环境下, 类似的社会剧变一般而言会发生在社会约束的公共机制几乎已经消失, 以及地区共同体已经不能再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之后。与“依靠”自己资源的条件反射相反的是, 这种真空倾向于再一次用新的超地方性的力量来填充, 而这种力量力图利用国家对强制的垄断在社会范围内强加一种新的秩序。政治力量非但没有瓦解, 实际上反而因此变成了新出现的秩序背后惟一的力量。在它的行进当中, 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在旧权威的毁灭或瘫痪中备受打击, 因而它没有受到经济和社会力量的阻止和限制。

当然, 这仅是一种理论模式, 在历史实践中很少被完全实现过。不过, 它的应用在于引起对那些使种族灭绝的趋势似乎更有可能发生的社会错位的注意。社会错位在形式和强度上各异, 但它们在一般性的后果上达到统一, 即都导致了政治力量显著地凌驾于经济和社会力量之上, 国家显著地凌驾于社会之上。在十月革命以及随后旷日持久的把国家作为社会整合和秩序再生产的惟一因素而加以垄断的时期里, 这种错位或许走得最深也走得最远。在德国, 它们也比公众想像中的要走得更深、更远。在魏玛共和国短暂的间歇之后, 纳粹党人的统治承担并完成了魏玛共和国——旧的和新的(还不成熟) 精英之间不安心的相互往来, 实际只表面上类似于政治民主——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施的变革。旧的精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或者清除。代表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形式一个接一个被分解并代之以新的、中央管理的形式, 这些新形式源自于国家, 同时也通过国家得以合法化。所有的阶级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但遭到最根本打击的还是只有以集体的形式才能具有非政治性力量的阶级, 也即无产阶级, 尤其是工人阶级。跟随地方政府几乎完全服从中央控制而出现的所有自治劳动机构的国家社会主义化或者是解体, 造成了普通群众在实际上失去了力量, 并且由于各种实际目的而被排斥在政治程序之外。加之国家行动有无法穿透的保密之墙的圈隔——实际上是用以对付所统治的人民的秘密国家阴谋——社会力量的反抗因而受到阻碍。总的、最终的结果是, 取代传统权威的新的、有活力的公民自治的力量, 而是政治国家的几乎完全垄断, 并造成社会力量无法自我表达, 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政治民主的结构性基础。

现代的条件也使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得以出现, 它能够用政治命令和管理代替全部的社会和经济控制网络。更重要的是, 现代条件为那些命令和管理提供了物质基础。我们应当还记得, 现代性是一个人为的秩序和宏大的社会设计的时代, 是一个设计者、空想家以及——更一般而言——“园丁”的时代。园丁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块需要专业设计、然后按设计的形态进行培植与修整的处女地。

野心和自信是无限的。实际上, 经由现代力量的奇观, “人类”看起来是如此的无所不能, 而其个体成员又是如此的“不完善”、无能和柔顺, 还需要太多的进步, 以至于可以将人们视为需要修整(如果有必要, 可以根除)的植物或需要饲养的家畜, 这看起来似乎一点儿也不稀奇古怪或在道德

上令人厌恶。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的和主要的思想家之一达雷就将畜牧业的操作作为将来的民族政府要实施的人口政策”的模式：

一个人如果任其花园中的植物自然发展，他很快就会惊奇地发现花园里长满了野草，而且连植物最基本的特点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这个花园还要作为植物的培育地，换句话说，如果要使这个花园超越无情的自然力量的法则，那么就必须要有有一个园丁的塑造能力；园丁所要做的是：为植物生长提供合适的环境，或者排除不良影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悉心照管需要照管的事物，并且无情地消灭那些将夺取更优良植被的营养、空气、光线和阳光的野草……因此，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认识，即培育问题对政治思维而言并非微不足道，恰恰相反，这些问题必须被放置在所有考虑的中心，并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必须是出自一个人的精神立场，出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甚至应当主张，只要一个构思精妙的培育计划能在其文化的正中央立足，一个人就会达到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平衡……

达雷明确彻底地说出了“改善现实”的野心，这些野心形成了现代思维方式的本质，并且也只有现代权力的资源才允许我们严肃地去酝酿这种野心。

社会错位变得深入的时期，也就是现代性这种最显著的特征开始盛行的时期。实际上，在此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如此形容不整——“未完成的”、模糊的和易弯曲的——简直在等待一种想法和一个灵巧机智的设计师将它塑造定型。在此时期，社会似乎缺乏其自己的力量和取向，因此也就无法抵抗园丁的照管，而随时准备着被挤压成园丁所选择的任何形状。可塑性和无助的结合构成了自信的冒险空想家很少能够拒绝的吸引力，这也构成了空想家不会被抵制的环境。

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大屠杀的秘诀。大屠杀成为了实施宏伟设计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因此，适合实施大屠杀的条件是特别的，但一点儿也不异常是罕见的，但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条件不是现代社会固有的属性，但也不是一个外来的现象。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大屠杀就既不是异常现象，也不是一次功能失调。大屠杀展示了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机械化趋势不受到控制和减缓，如果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在实际中被销蚀，那么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就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一个有意设计、彻底控制、没有冲突、秩序井然和和睦谐调的社会的现代理想才会有这样的趋势。任何基层表达利益的能力和自治的能力受到削弱、每一次对社会和文化多元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机会的攻击、每一次利用政治秘密之墙隔离出国家不受制约的自由的企图、每一个弱化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的步骤都使得大屠杀规模的社会灾难发生的

可能朝前迈了一小步。犯罪计划需要社会工具才会起作用。而那些想阻止计划实施的人的戒备也同样如此。

至今用于戒备的工具似乎是短缺的，而那些看似能够为犯罪计划效劳的机构，或者（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些无法防范完成普通任务的活动带上犯罪性质的机构，却并不短缺。研究信息技术（一个公认近期研制出的新技术，在纳粹大屠杀时期还没有出现）的社会影响的最敏锐的观察家和分析家怀贞鲍姆认为，产生屠杀性行为的能力，如果有的话，已经增强了：

德国把实施其“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作为工具理性教科书式的演练。当人性无法将目光从所发生的事情身上移开、当屠杀者自己拍摄的照片开始四散传播、当令人同情的幸存者再次进入视线时，人性暂时颤栗了。但到最后，一切如旧。同样的逻辑、同样冷酷无情地对计算理性的应用，在未来二十年内将杀害至少与已成为千年德意志帝国的工程师的受害者一样多的人。我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今天与那时，文明都是一样地危险。

而且，那些使得工具理性和发展起来为它效劳的人类网络在当前和以往一样道德盲目的原因实际上并未发生变化。

1966 年，令人发指的纳粹罪行被发现二十多年后，一群杰出的学者设计了堪称科学上精巧和典范的电子战场计划，以协助越南战争中的将领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提出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同那些被他们交给他们的赞助者的意见所产生出来的武器系统致残和杀死的人保持着巨大的心理距离。”由于和在此之前的所有技术相比，在湮没其人类目标之人性上（“人、物品、事件被‘程式化’，人们谈论的是‘输入’和‘输出’，反馈回路、变量、百分比、程序等等，直至最终所有与具体环境的联系都被抽象掉。然后只剩下图表、数据集合和打印输出。”）都要做得更为成功的新的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心理距离就无法遏制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纯粹的技术进步从一切慎重选择的以及话语一致的人类目的中获得自治也是相同情况。既有的技术手段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在破坏着对自己的使用，并使对后者的评价隶属于自己的效率和有效性标准。同理，行为的政治和道德评价权威也已经被缩减为次要的考虑——如果没有被怀疑或被认为无关的话。行为几乎不需要任何其他的理由，而只需既有的技术使其成为可能的认可。雅克·埃鲁尔曾经告诫说，由于已经从话语型的社会任务中解放出来，技术

**决不会发展成任何事物，除非由于它受到了来自后面的推动力。技术人员不关心他为什么而工作，并且总的来说，他也不在乎。他工作是因为他有仪器设备，这允许他完成某项任务，并在新操作中取得成功……没有任何朝向目标的号召；有的只是放在背后的发动机的限制，以及不容许机器停止运转所带来的限制。**

一旦盘算效率在决定政治目标时取得了最高的权威，不再能够指望反对不人道的文明保障来控制人类工具理性潜能的运用，希望就越加渺茫了。



小鸟文学出品  
2023.02 特刊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